論　著

女性與博覽會：以 1907 年兩場展覽為例 *

吳　方　正 **

摘　要

性別角色分派長久以來是維繫社會秩序的條件之一。20 世紀初的中國，經歷了一個性別角色重整的階段。本文的目的，不在探討有　些女性意識覺醒、或性別平權的訴求，讓女性擺脫體制的羈絆，而在於觀察怎樣的體制改變促使女性調整她們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即使是不自覺地。選取的觀察場域是清末中國參與在中

* 本文承兩位審查人不吝指正，謹此致謝。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之部分，計畫編號 NSC 96-2411-H-008-004-。

**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舉辦的博覽會。

本文選取兩個發生於 1907 年的案例，一是中國參加的「梅勒本女工賽會」，另一個是同年在上海舉辦的「萬國賽珍會」。這兩個以女性為中心的展覽，都不是由中國發動，中國正面回應的目的，也都不是提升女性地位；但中國的參與，觸動了將女性納入國家生產力結構的議題，提供了女性進入更寬廣社會空間的機會，也促成了舊時性別分派框架的逐步鬆動。

關鍵詞：性別角色分派、體制、博覽會、梅勒本女工賽會、萬國賽珍會

> 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閒暇的時間。」這三點都很扼要，只可惜我們中國禁不起這三層考察。這三點之中，無論哪一點都可以宣告我們這個國家是最野蠻的國家。
>
> 胡適[1]

前言：女性社會角色分派

胡適的朋友考察國家文明的三件事，關係到的是社會生

[1] 胡適，〈慈幼的問題〉，收入氏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卷 1，頁 923。編者註：「原是黏附剪報，胡適題注：十八年一月作的，無報名和日期」。

活與生命中比較弱勢、邊緣、無用的部分：相對於有用成人的小孩、相對於有用男性的女性，以及相對於有用工作的閒暇。提出這三件待考察項目者，顯然是有閒暇來思考如何利用閒暇的男性成人。胡適沒有說他的這位朋友是西方人或中國人，但在一個具有「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觀念傳統思想國家中，倒溯百年，這三件事與國家文明程度的關係，幾乎不構成任何值得提出的問題，如果提出這三個標準的是一位 1920 年代末期的中國人，這已經是不小的成就。當然，只要改變時空尺度，幾乎所有的無用之物都有用，很少有認眞做事的時間是浪費掉的，但是在有限脈絡中，仍然可以區別出常識層次的有用與無用。如果胡適的朋友是一位西方人，從西方以otium（身體或知性休閒）對立於negotium（致用或公共事務）的思考傳統，對於無用與有用的考察，通常在於找到兩者的連通。[2] 小孩與女人關係到的是從男性中心視角出發的最基本社會關係，以女性與兒童爲中心的家庭，使得人們開始爲自己以外的人努力，接著發展出更複雜的社會組織，然後開始有了文明。[3] 至於第三點，文明進展的主

---

2 關於古羅馬時期休閒概念的研究，見 Jean-Marie André, *L'otium dans la vie morale et intellectuelle romaine des origines à l'époque augusté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 J.P. Toner, *Leisure and Ancient Ro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關於文藝復興時期以及之後的休閒概念，見 Peter Burke, "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 146 (February 1995), pp. 136-150; Julia Conaway Bondanella, "Petrarch's Rereading of 'otium' in De 'vita solitar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60:1 (Winter 2008), pp. 14-28; Bruce G. McNair, "Cristoforo Landino and Coluccio Salutati on the Best Life," *Renaissance Quarterly* 47:4 (Winter 1994), pp. 747-769.

3 參考 Alan P. Fiske 從 Max Weber, Jean Piaget, Paul Ricoeur 的理論與人類學研究綜合整理出來的四種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人類關係形式：communal

要原因，在於我們不再僅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經驗，而是間接學習別人的經驗，並從經驗形式推演出規則與知識，這些學習通常是在沒有積極工作活動時進行，反饋到致用範圍，從而將無用連結上有用。換言之，使得修養厚積的多半是休閒，而不是工作。

胡適引用這段話的時間在參觀 1929 年西湖博覽會之後，他的關注並不在上述的區別與關連。雖然他說文章只在「看看我們怎樣對待小孩子」，而不論其餘兩點，但談兒童的養育與教育而略過作爲母親的女性畢竟有些困難，以至於文中很快就承認：「慈幼運動的中心問題是養成有現代知識訓練的母親。母親不能慈幼，或不知怎樣慈幼，則一切慈幼運動都無是處」，小結是中國的慈幼運動應該注重「（甲）女學的擴充，（乙）女子教育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所說的女學或女子教育的對象，應是接近適婚年齡的女學生，要女學生「學養子、學教子、學怎樣保護兒童的衛生，然後談戀愛，擇伴侶」，[4] 但對同年齡的男學生並沒有類似的要求。綜觀胡適所謂的慈幼運動，除了醫療公衛教育等體制外，男性在慈幼中是缺席的，就有如生養小孩只是女性的事一般。指責過去男性以父權宰制女性是一種廉價的批評，相同的概念套用於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常有不同的面貌，而有時善意的父權造成的傷害和出於惡意者相同，甚至爲害更烈。[5] 如果胡適對性別角色的認定在今日看起來不合時宜，

---

sharing, authority ranking, equality matching, market pricing；見其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p. 1-39.

4 胡適，〈慈幼的問題〉，收入《胡適日記全集》，卷 1，頁 923。

5 Peter Glick and Susan T. Fisk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這只不過顯示性別角色是一種社會建構。[6] 因此，用現在的標準去檢視當時全中國最明智開放頭腦之一的胡適，並不恰當，但這也顯示胡適在 1929 年有一套關於性別角色分派的基本意識形態，主導了他的整個論述。

在胡適談慈幼問題的年代，國家「文明」與「現代化」這兩個詞有相當大程度的重疊。中國有意識的現代化至少可以上溯到 19 世紀下半，至今百餘年來，東亞地區現代化議題的主軸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現代化牽涉到社會分工的重組，而有一部分既有分工是直接依據性別角色分派的。本文關注的是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女性的性別角色分派因爲這個歷程而有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實際顯現在哪些可觀察的事物上？更具體地說，從物質研究角度，長期以來被歸屬於女性的實踐與物品，因爲現代化歷程而有了哪些變化，從而使其實踐者既定的性別角色得到重新檢驗。因此筆者試著將胡適所引的三件事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程度，做一點修改，使之聚焦在女性的性別角色，以及交疊在這個層次上，如何將女性閒暇之無用轉化爲有用的問題：第一，看我們怎樣待女人；第二，看我們怎樣待小女孩；第三，看我們的女人怎樣利用閒暇的時間。第一點關係到性別角色定義，確定之後，影響到如何將小女孩教育成未來符合這個角色定義的女人，於是小女孩的服裝儀容、行爲舉止有了規範、天職與母儀婦道的輪廓成形；至於女性怎樣利用閒暇時間，是閒居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March 1997), pp. 119-135.

6 Mari Mikkola,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Gender,”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2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2/entries/feminism-gender/(2015 年 10 月 20 日檢索）。

爲不善？還是利用閒暇，將自己修養到能優雅地像男性文人般「閒敲棋子落燈花」？或是較直接地將家庭變工廠，將閒暇轉換爲工作？這三種方式，意味著或將閒暇用在常識判斷層次上被貶抑的無用事物或活動上，或用在需要相對長時間才能顯現效益的修養，以及直接把閒暇轉變成有用的產出。20 世紀初，清末新政的一部分目的在快速動員閒置人力，以提高生產力，女性也被納入動員目標，因此第三種方式似乎是唯一恰當的。

在本文的框架下，必須先區別出有哪些符合女性角色定義核心，且原本就已經存在的活動，是可以由閒暇轉變爲具備生產力的工作？從這個角度，投入農事的女性勞力、紡紗廠之類的工廠女工都可以先排除，因爲她們之所以爲農婦女工，多半並非基於性別角色分派，而是來自不分性別的經濟因素。我們立刻發現，意識形態從來不在物質社會眞空中進行，它需要一些實踐作爲載體。然而，我們一般認定的女性外表與行爲規範，是一種文化而非生物意義上的女性，只針對部分的閨閣貴婦們，以及由這些女性具現的標準。換言之，上層女性既不需要將客廳變工廠，又不宜閒居爲不善，我們要問的是：有哪些上層社會女性的閒暇活動是合乎前述第二種方式（修養），又可以具有經濟產值的？如果我們將藝術定義爲做得比平常更好，在所有的生產中與閒暇最有關係的是藝術，因爲這意味著我們有閒暇去做這些沒有必要的事，放在本文脈絡下，就是與女性角色相符的藝術活動，例如刺繡女紅。[7] 對於社會上層女性而言，刺繡和大部分的藝

[7] Grace S. Fong,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術活動一樣，產品本身經濟價值的重要性，遠不如刺繡活動本身所帶來對行爲主體的陶冶價值。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之一，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包括任何以主體意識爲中心的文化活動，例如藝術、知識學習、宗教信仰與慈善事業。[8] 換個方式說，中下階層家庭女性多半也從事紡織針黹，但那是工作，必須更多的物力資本——尤其必須有閒暇，才能將必需與日用之物提升到稱得上藝術的刺繡與女紅，除非這類原本屬於閒暇的事物能夠以產業形式產生經濟利益，例如繡莊。

然而，單從「女紅」這個詞，就足以說明刺繡女紅是一個原本就被分派給女性的藝術實踐。當我們說某些人擅長、適合、擁有某種與生俱來的本事時，一方面意指這些人不擅長別的事，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其他人不適合做這些事。就「女紅」而言，女性在這個實踐空間得到保護，但同時也被誘陷在圈定範圍內活動。這個情況在 20 世紀初有了一些改變，同樣的活動置入不同的框架，羈縻可以變爲解放的力量。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於將這種分派給女性的實踐在 20 世紀初的變化，視爲當時女性角色定義改變的反映；另一方面，則將這些變化視爲導致女性角色定義改變的動因之一。從第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pp. 1-58.

8 Paul Wood 稱之為意義的商品化，見 Paul Wood, “Commodity,” in Robert S. Nelson & Richard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57-280; 關於知識的商品化，見 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 G.S. Noerr, trans. E.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3;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4-5.

一個面向，除了傳統的家庭閨閣與商業繡莊外，刺繡女紅在 20 世紀初被帶入一些新出現的社會空間中，其一是新式女子教育，其二是博覽會展示空間，而且兩者相關並互涉。從第二個面向，在這些新的社會空間中的活動，有些與性別角色定義無關的先設，圈定了藝術實踐的方向，包括在這個範圍內的女性藝術實踐，從而使得女性的性別角色定義被置入問題，導致後者的重整。

女性藝術的新實踐空間：學校與展覽會

1904 年頒布實施的〈奏定學堂章程〉，展開了中國教育體制的現代化，但開始時僅涵蓋男性學生，亦即科舉取士以來主要且唯一的教育對象。但新式教育的精神是普通教育，上智下愚一律受教，這個基本精神導出了一個邏輯結果：就教學成效而言，教女學童比教男學童有一半機會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率。1907 年，學部終於頒布了〈女子師範學堂章程〉與〈女子小學堂章程〉，原因是女學堂的數量已經多到必須立法節制。[9]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爲了讓教育投資者能估算對國家而言較高的報酬率，必須先考慮「女生上學後要給她們什麼工作」，而且不會有擾亂既有秩序的副作用？在教育的現實空間中，立法者也立刻面臨一個問題：女學堂除了只收女生外，有什麼特殊的教學內容是爲小女孩量身定做的？如果我們不把修「身」和「體」操當作學科，到今天我們還是很難想像有女性版的國、英、數、理、化。引人注意的是，

9 〈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東方雜誌》，卷 4 期 4（1907 年 5 月），頁 9278。

此時的學科性別化聚焦在藝術上，在男生是手工，在女生是女紅。[10]

新式教育是 20 世紀初中國求迅速富強的策略之一，但如何證明策略有效？國家可以等待二十年後驗收成果，但涸轍之魚需要的不能是這麼無邊際的許諾，爲了維持希望，大部分個人需要的是切身感受得到的象徵，而不是推理得出的結果，傳遞這些象徵的管道之一就是展覽，例如學堂成績展覽會。和一般商品展示不同的是，現代展覽的核心並非僅在貨物與金錢的交換，更多的是附在物品上資訊與象徵意義的流動、對接受對象的無差別開放，以及除了現實目標外，「展」與「觀」的自我指涉，亦即無目的地、爲了展示而展示，爲了觀看而觀看。從這個角度，學堂成績展覽會目的並不在於出售學生現在的作品，而在於藉這些作品傳遞作者（學童）未來可以有怎樣生產力的訊息，但爲了符合無目的觀者的需求，學堂成績展覽會採用了博覽會之類的工商展形式。[11] 基於此，觀察女性藝術實踐與從這些實踐顯露的性別角色分派的理想場域就是展覽，因爲展覽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力求可見，甚至讓可見的比實質內容還多。

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提及日本博覽會，中國人習慣將博覽會稱爲賽會、賽珍會、炫奇會。[12] 其中，賽會一詞是借

---

10 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收入顏娟英主編，《上海美術風雲——1872-1949 申報藝術資料條目索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頁 24-29。

11 吳方正，〈中國近代初期的展覽會——從成績展到美術展覽會〉，收入顏娟英主編，《中國史新論．美術考古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 477-544。

12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卷 24 期 3（1986 年 9 月），

用自民間宗教節慶的賽會。類似西方的嘉年華會，就有限時間、男女雜沓看熱鬧而言，賽會與博覽會確實有相通之處，是以有司與有識之士懼怕失序脫軌，輒謂賽會宜禁。1886年，在上海擬辦博覽會的背景下，《申報》上即有一篇文章〈論賽會不宜趨看〉：「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言人生日用之外皆有損無益，不許妄作，而於迎神賽會尤甚，……，不作無益害由茲而起」，文章中段舉了許多因賽會而生的亂象與災禍，文末提及了歐美博覽會與中國迎神賽會的差別：

> 東京法字報言，法國定於明年設一大會，集普天下之物產奇珍，悉萃于會，又與昨所論英國物會不和而同。馳域外之大觀，迥非尋常賽會可比，名同而實異，視勞精敝神用心於無用之地，不特虛糜財貨且虞別釀禍端者，不可同日而語矣。[13]

文中所謂的法國大會，指的是 1889 年萬國博覽會，但作者也沒有說明如果中國賽會非「人生日用」，爲何「馳域外之大觀」的英法博覽會就可以免去這個嫌疑？

另一方面，至少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朝政府對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態度多半是消極以對，或逕交海關辦理，或如最常見的說詞：「分咨南北洋大臣各省督府將軍暨札飭總稅務司曉諭商民參加」。過去關於中國與萬國博覽會的研究，多半將「國際觀」、「開放性」當作價值判準，中國積極參與萬國博覽會被賦予正面評價，反之則被視爲保守，不求進步，這種解讀角度傾向於將清朝官員視爲盡皆迂腐愚蠢，實際上也可說是一種以今度古的政治正確。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

頁 249-266。

13 〈論賽會不宜趨看〉，《申報》，1886 年 5 月 12 日，第 1 版。

萬國博覽會是一整套造成財富集中的西方資本主義遊戲之一，並不是所有參與者皆必然獲利。以 1894 年比利時安特衛普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d' Anvers)爲例，當時中國參與的情況爲：「有粵人五名運賽雕牙古玩等物，因物美價貴，恐難銷售。浙人張堯賡向在比國貿易，此次入會所運盡係日本貨，易於獲利」。[14] 這正足以說明在這種遊戲中，弱國若無集體性作爲，只會被剝削得更慘。整體而言，庚子之後清廷對博覽會轉趨積極；1903 年，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中國除了送件在日本「內國」博覽會參考館展出外，中央與地方都派出大量人員前往參觀；[15] 1904 年，清廷更斥巨資參加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16]

應該思考的是，中國對博覽會的正面態度是與新政實行一起出現的，這是歷史偶然，或是兩者之間有相關性？如果將新政視爲博覽會的必要條件，我們便較容易理解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對博覽會的態度，以及中國對博覽會前拒後迎的

---

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比使照請派員赴安法爾斯萬國衔奇會及附設化學會議案」，檔號：01-27-012-01-000-031。

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舊署清檔），〈各國賽會公會〉，「日本公使照請中國赴大阪關第五次勸業博覽會案」，檔號：02-20-001-01；呂紹理，〈展示臺灣：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臺灣史研究》，卷 9 期 2（2002 年 12 月），頁 103-144；許峰源，〈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清末中國博覽會的興起〉，收入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上冊，頁 136-151；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卷 21 期 2（2010 年 6 月），頁 107-164。

16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421-475。

基本理由。要言之，資本主義模式下的新式教育與工商產業發展是參加博覽會的應備條件，而兩者內容都包含了動員女性閒置人力的動機。但，如果中國在 19 世紀後半參與的萬國博覽會中，不乏刺繡女紅之屬的送展品，有甚麼理由使得博覽會提供給女性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活動舞臺？本文首先檢視一個恰好在〈女子小學堂章程〉頒布實施的 1907 年出現，而且專屬女性工藝的博覽會。

梅勒本女工賽會 (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an's Work)

1907 年 10 月 23 日，第一回澳大利亞婦女工作成果展覽會(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an's Work)在墨爾本(Melbourne)皇家展覽館(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開幕，11 月 30 日閉幕，分布在 500 個類別的 16,000 件展品，在近六週展期中吸引了 250,000 名觀眾，展覽收入 16,000 鎊，略有盈餘。[17] 與萬國博覽會比較，這個地區性展覽規模並不大。以展覽性質而言，這也不是在澳洲舉辦的第一次女性工藝產

---

[17] Emma Willoughby, "Woman Making an Exhibition of Herself: The Women's Work Exhibition, 1907," *Melbourne Historical Journal* 29 (June 2001), pp. 158-169; Elizabeth Taylor, "Lady Northcote: Leading Light and Sponsor of the 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in Rosemary Francis, Patricia Grimshaw, and Ann Standish, eds., *Seizing the Initiative: Australian Women Leaders in Politics, Workplaces and Communities* (The 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2), pp. 37-49. 在本文當下論述框架下，筆者採今日通用譯名。在作為事件史料脈絡下，筆者採用「梅勒本女工賽會」，以下皆同。

業博覽會。[18] 但就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而言，即使過去曾經偶有女性製作的工藝品廁身送展物品中，但淹沒在大量男性製造的產品中，女性以及與女性連結的物品多半隱而不顯。這是第一次中國有機會、被限制（只有女性有資格參加），而且願意以女性生產物品爲主體，代表中國出洋展覽。對參展的中國女性而言，這也是第一次有機會藉產品在國際上再現自己，這個「自己」有兩個層次：中國、中國女性。

這個展覽出現在 1901 年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成立後六年，在 1907 年大英帝國殖民地會議(Colonial Conference)中澳洲被稱爲自治領(dominion)的同一年。[19] 展覽開幕的 10 月 23 日，除了即將返英休假的西澳大利亞總督外，其他五省總督全部出席，聯邦總督(Governor-General of Australia) Henry Stafford Northcote一開始致詞時，即宣稱這顯示澳大利亞聯邦所有人民在眞正聯邦精神下合作，努力向世界展現澳洲女性活力與能力的成果。[20] 明顯

18 Martha Sear, "'Common Neutral Ground': Feminising the Public Sphere at Two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n Exhibitions of Woman's Work," in Kate Darian-Smith, Richard Gillsepie, Caroline Jordan and Elisabeth Willis eds., *Seize the Day: Exhibitions,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 Bernard Attard, "Australia as a Dependent Dominion, 1901-1939," (Working Paper. Australian Studies No.115, Sir Robert Menzies Centre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 http://www.kcl.ac.uk/artshums/ahri/centres/menzies/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115Attard.pdf（2014 年 10 月 11 日檢索）。

20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The Opening Ceremony. A Brilliant Function. The Objects of the Project. Melbourne, October 23," *The West Australian* (Perth) 24 October 1907, p. 7, Article. 所有澳洲報紙之查閱均透過澳洲國家圖書館 TROVE 系統，本文以下皆同。

地，這個展覽首先在聯邦層次上，就已經浸潤在濃厚團結與澳洲認同的政治意涵中。

本文略過這個與澳洲國內政治有關的議題，觀察另外兩個與中國參展相關的面向。第一個是性別政治：女性投入具有經濟價值的工作，對女性的社會角色定位有何意義？首先值得參考的仍是聯邦總督 Northcote 的開幕致詞，他說：

> 女性的力氣幾乎全部被限制在家庭主婦責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生命的許多道路上，女性正在取得她作為男性競爭者的位置——負擔家計的人。這個展覽的本質，是在展示女性用以確保競爭有效所仰賴的技巧與資源。在這場競爭中，女性無可避免地將暴露在遠比她過去被賦予的家事更嚴苛的條件下，但我相信人類的騎士精神將確保她在這個（工作）領域中一個公平且慷慨的待遇。[21]

我們可以將這段話視爲男性官方的觀點，但當時的女性對展覽有何反應？早在開幕六個月前，一位署名 Adrienne 的作者在 *The West Australia* 發表她對展覽的想法：

> 展覽的效應將十分深遠，我們將難以評估對女性個人或集體的結果會是甚麼，但我們仍可以做一些安全的預言。無可置疑地，這個運動將會是對全世界女性勞動工作理念目標的有力支持，因為它將會是顯眼地樹立在眼前的女性在藝術與實業世界中所為的活生生

---

21 “Women’s Work. A Cosmopolitan Exhibition. The Opening Ceremony, Melbourne, October 23,” *The Advertiser* (Adelaide) 24 October 1907, p. 7, Article; “Women’s Work Exhibition Opened by Lady Northcote. A Brilliant Function. Message to the Queen,” *The Argus* (Melbourne) 24 October 1907, p. 7, Article. 筆者自譯，文責自負，以下皆同。

> 表現，而且它所揭露女性作為工作者的能力與價值，遠比任何具有攻擊性的作為更可貴。人們的注意力將聚焦在女性從事的各種工藝，而各種關係到勞苦營生婦女的工作條件與薪資問題將會隨風而散。或許，那些奇怪、偏執的公共意見會受到更大的推力，朝向比之前更細緻的公義尺度平衡去考量。在委員會委員們對全澳洲各個領域的檢視中，階級與階級、女性與女性的距離會被拉近，而無知——互相體諒的唯一障礙，將被打破。然後，或許不為人注意、沉悶陰鬱勞動的灰鉛氣息將被轉變為相互理解與互助。[22]

中國接收到這樣訊息的言外之意了嗎？想過拉近社會階級的問題嗎？準備給婦女更公平的工作條件與薪資嗎？如果賺錢養家的是一家之主，中國準備接受女性的一家之主嗎？中國思考過這樣的展覽可以延伸到女性工作與社會公平的問題嗎？我們或許要求太多，澳洲自己也不見得達到他們期待的理想。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關係到展覽會事務的組織運作。澳大利亞婦女工作成果展覽會的推動以總委員會(general committee)爲首，總委員會授權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後者再動員各地區分會，和一般國內型博覽會從中央到地方分層授權、從地區展覽匯聚成全國展覽的運作組織類似，[23] 此次的差別在於展覽會的主角是澳洲婦女工作

---

22 Adrienne,“ The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The West Australian* 19 April 1907, p. 3, Article.

23 舉例而言，1907 年 8 月底西澳大利亞婦女工作展在伯斯(Perth)市政廳舉行，聯邦總督夫人 Lady Northcote 前來主持開幕典禮，當地報導中列出了各級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Perth, The General

成果。不意外地，總委員會由澳洲聯邦總督夫人Lady Northcote任主席，其餘成員皆高官夫人，層層下分的各級委員會成員，其實也就是澳大利亞聯邦男性統治系統的夫人版副本。[24] 如同大部分殖民地總督夫人與上層階級婦女，她們的權力來自丈夫，推動計畫成功的程度與得自男性配偶給予支持的程度成正比，以致於這些上層階級婦女的公共事業，通常也是其男性配偶的政治延伸。[25] 以 1907 年 10 月 23 日的展覽開幕儀式為例，第一位上臺演講的是維多利亞(Victoria)省總督Sir John Madden，亦即墨爾本所在的地主，其次是總委員會主席Lady Northcote，最後是澳洲聯邦總督Northcote與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總督Sir H. Rawson。作為展覽會主席，Lady Northcote的致詞簡短到只有一句：“I have very great pleasure, in declaring open this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for all Australia”，接著她向前按下按鈕，發出向女王致敬的電文，但連這份以其名發出的電文，都是由接著上臺的聯邦總督丈夫幫她念的。[26]

不論這些女性如何在她們的丈夫身邊後退一步，整個展

Committee, The Fremantle Sub-Committee, Busselton Sub-Committee, Cottesloe Sub-Committee, Leederville Sub-Committee, The Northam Local Committee, Subiaco Sub-Committee, Victoria Park Sub-Committee……。“The Women’s Exhibition. Remarkable Success,” *Western Mail* 24 August 1907, p. 39, Article.

24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an’s Work,” *The Border Watch* (Mount Gambier) 3 April 1907, p. 4, Article.

25 Elizabeth Taylor, “Lady Northcote: Leading Light and Sponsor of the 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pp. 38-42.

26 “Women’s Work. A Cosmopolitan Exhibition. The Opening Ceremony, Melbourne, October 23,” *The Advertiser* 24 October 1907, p. 7, Article.

覽的籌備推動與展品彙集畢竟是由一個婦女團體包辦的。更進一步來看，這個展覽會的籌辦不僅向內深入，更向外擴張，首先是英國本土、各大英國協自治領與殖民地（加拿大、印度、南非），其次是歐陸與世界各國，中國與日本在這個脈絡下獲邀。贊助與參展名單從英國王后Alexandra起，接著是一長串的王后、公主、公爵與伯爵夫人、（美國）大使夫人名銜。換言之，推到澳洲之外，籌展的基本模式仍是以貴婦領軍的女性團體爲門面，即使整個機制簡化一點。[27] 這個模式在中國就有問題了：綁小腳的官夫人們很難走出自家大門，更不用說，中國大官丈夫會願意委託並授權她們進行夫人政治與夫人外交。那麼，澳大利亞婦女工作成果展覽會在中國的對應機構是甚麼？

七年之病與三年之艾

由於自治領沒有外交自主權，澳大利亞展覽會對中國發出的邀請，是由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轉交的。從外務部檔案所見，中國政府處理此事的是甫改制成立一年的農工商部。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 2 月 13 日（西曆 3 月 26 日）收朱邇典函起，至 7 月 7 日（西曆 8 月 15 日）農工商部將參展物品清單咨呈外務部請轉照會英使止，農工商部做的是透過各地商會轉知搜集。[28] 1907 年 5 月初，農工

27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The Queenslander* (Brisbane) 6 July 1907, p. 7, Article.

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1～008。

商部札商務總會，飭總會遍告各項商人：「倘有新奇之品果出於女工之手者，務於四月以內由該總會代寄本部，仍俟審定後再行設法彙寄，藉以表彰中國女紅之成績，本部有厚望焉」，顯示農工商部願意擔負運費，條件是要先審查過；在同一份札文中，農工商部分送女工賽會章程，說明搜集對象：

> 立此會之意，欲得各國女工手作，不求賽□精巧，祇求研究工藝。所謂女工者，或婦人工作，或少女工作，或鋪工或家工，或古□或新作，或學堂或住家女工均可，其鄉間女學堂工作則更妙。[29]

必須一提的是，這是在學部頒布〈女子師範學堂章程〉與〈女子小學堂章程〉的同一年，欲得「更妙」的參展品，無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中國方面接收訊息並不全經外務部——農工商部——各地商會的管道。上海商會回報農工商部稱，上海天足會書記員沈敦和函稱：「於未奉部箚以前，適接梅勒本女美術會書記員電請爲該會駐滬招來員，業將天足會製就之件一併逕寄賽會開單，請爲轉咨貴部，轉復英使查照」。[30] 梅勒本女美術會書記員不知何許人，天足會送展品清單不見於外務部檔案，但明顯地展覽的訊息在上海商會接到農工商部通知之前，即已先抵達天足會。上海天足會是一個 1895 年由寓居上海的「洋貴婦」發起的組織，1906 年底轉交華人接辦，由沈敦和出任會長。[31] 本文下節探討的事件與天足會密切相

29 〈農工商部札商務總會文〉，《申報》，1907 年 5 月 5 日，第 20 版。

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9-049～053。

31 苗延威，〈晚清寓華「洋貴婦」的社會參與——以上海天足會(1895-1906)為中心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2

關，故在此先行按下。但天足會參加墨爾本展覽會的物品是由該會的中國婦女生產製造，對外聯繫的窗口是其書記員沈敦和，這在各國純女性參與籌畫的展覽中顯得格格不入。

由在華傳教士管道送展的是另一些未經中國官方管道參展的物品，澳洲報紙零散訊息顯示，有些展品來自在香港、Kin Kiang（疑爲Kiu Kiang，九江）的法國修院、在寧波的修院以及徐家匯。[32] 有一批上海教會女學堂送出的展品是透過鐵行輪船公司（Peni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簡稱P. & O.）澳洲維多利亞籍經理White的夫人特別關照下寄出的。[33] 筆者無法查證這批展品與天足會是否有關，但墨爾本展覽會中的中國出品還包括：1906-1907 年間奉派前往紐澳調查中國移民情形、準備設領事館的黃厚成贈送給Northcote夫人的五摺十面刺繡屏風。[34] 要說黃厚成不知道澳洲此刻正有個梅勒本女工賽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件

本第 1 分（2011 年 3 月），頁 129-167。

32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The Queenslander 6 July 1907, p. 7, Article; "Women's Work Exhibition. The Opening Ceremony. A Brilliant Gathering. The Royal Exhibits. (From Our Special Representative.) Melbourne, October 25," *The Queenslander* 9 November 1907, p. 7, Article.

33 "Women's Exhibition. Caulfield Cup Day," *The Maitland Daily Mercury* (New South Wales) 23 October 1907, p. 6.

34 黃厚成由駐英使館派赴紐澳調查，此刻的名銜是四品特使(Imperial Commissioner)；"A Gift from China, Melbourne October 20," *The Register* (Adelaide) 21 October 1907, p. 5; "Chinese Commissioner Hwang Hon Cheng in Melbourne," *The Argus* 5 November 1906, p. 8, Article; "Visiting Chinese Dignitary," *The Australasian* (Melbourne) 10 November 1906, p. 37, Article. 關於黃厚成在澳洲之行，見楊永安，《長夜星稀——澳大利亞華人史 1860-1940》（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 200-201。

送給聯邦總督夫人的外交禮品明顯出自配合展覽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從黃厚成的觀點，對應女工賽會的中國特產是刺繡。這件刺繡是否出自女性之手？倒是另一回事。

上述參展品或零散，或僅知其有，至目前爲止，最完整的中國展品資料來自農工商部繡工科送件清單，亦即除了上海天足會自寄展品外，各地商會顯然都沒有回應，連審定的對象都沒有，以至於農工商部只好內求於下轄的繡工科。光緒三十三年(1907) 7 月 7 日（西曆 8 月 15 日）農工商部將參展物品清單咨呈外務部，內容主要有幾個部分：1.總教習沈壽繡山水、人物、花鳥屏五件；2.副教習金靜芬、徐芝琴、沈靜蘭、朱星伯繡花卉屏各一件，以及合繡洋文橫額、橫屏各一件；3.學生繡件三十件；4.蘇州福壽美術館大型繡虎與繡仙女二件；5.金章與邱棂花卉、魚藻繪畫三件。[35]

1903 年清廷設商部，1906 年將工部併入商部，改稱農工商部。改制之前，原本就有一些各部所轄局所學堂，1906 年〈農工商部官制草案〉第九條說明：「除以上額設之二廳三司外，其左列各項局所學堂悉仍舊制。商標局（該局事務較繁……）、商報館、京師上海各實業學堂、藝徒學堂、工藝局（附勸工科）、勸工陳列所、農事試驗場（附高等農學堂農務局）」，繡工科爲舊制所無，不在其中。[36] 但 1905 年中，商部即已規畫在工藝局下增添一繡花科，當時因爲「繡花一科精於刺繡堪爲教習者，甚難其人」，擬延聘「浙江舉

3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9-049~053。

36 〈閣部院官制草案・農工商部官制草案〉，《東方雜誌》，卷 3 期 13 臨時增刊，1907 年 1 月（光緒 32 年 12 月），頁 36-37。

人余冰臣孝廉之夫人某氏」，此即余覺與沈壽。[37] 至 1906 年初，《東方雜誌》報導：

> 京師。商部為提倡女工，抵制洋繡起見，特在西單牌樓磨盤院設立繡工科，招考女生，延江蘇沈女士壽為總教習，繡藝之外，兼習粗淺國文及圖畫，女生大小以十二歲起二十歲為合格云。[38]

1907 年初，農工商部釐定職掌暨分司隸事辦法第九條爲：

> 臣部奏設之各項局所學堂，其目如左，一商標局，二商律館，三商報館，四公司註冊局，五京師實業學堂，六京師藝徒學堂，七工農局，八京師勸工陳列所，九繡工科，十農事試驗場附高等農學堂藝務局，十一化分礦質所現擬籌設，十二權衡度量局現擬籌設……。[39]

十二個局所學堂中，有兩個還在籌設階段，但繡工科則已正式入列。根據 1909 年農工商部繡工科擴充辦理情形摺，光緒三十二年(1906)開辦時學額 80 名。[40] 觀察送墨爾本展覽會的繡工科學生繡品清單中，列出的學生名字、年紀與修業時間，最後一項由四個月到一年不等，學習時間最短的兩個學生，此前已在家學過，但最長的也就是一年，可以推斷這

---

37 〈工藝局增添繡花科擬延教習〉，《申報》，1905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

38 〈實業・各省工藝彙誌〉，《東方雜誌》，卷 3 期 10（1906 年 11 月），頁 194。

39 〈內務・農工商部奏釐定本部職掌員缺摺〉，《東方雜誌》，卷 4 期 2（1907 年 3 月），頁 61-66。

40 〈農工商部部具奏繡工科擴充辦理情形摺〉，《農工雜誌》，期 3（1909 年 3 月），頁 13-15。

些是 1906 年中順利招收入學的女生。[41] 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局所學堂不同，繡工科是各局所學堂中唯一招收女生者，而且只收女生。

刺繡女紅和繪畫、雕塑、陶瓷、琺瑯、竹木雕等工藝類似，可以有一個追求普遍價值的藝術層次，也可以是和農工商相同的諸多經濟活動之一。從刺繡作爲藝術的角度，沒有證據指出，男性與女性刺繡者的天分和成就有顯著差異。如果以市場經濟爲判斷標準，當刺繡的性質偏向女紅而維持在家用與閨閣藝術實踐的私領域，刺繡確屬女性的範圍；但如果刺繡的性質偏向商品——尤其是高價商品，則至少在清末發達的刺繡產業中，這個領域中的主導權仍操在男性手中，亦即刺繡這個「行業」是男性的。[42] 今天我們普遍認爲包括

4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9-049~053。

42 以「刺繡」為關鍵詞檢索《申報》，自 1872 年至 1910 年代中期，只有 1881 年 8 月蘇州、1888 年 4 月溫州的兩個案例顯示繡工為男性，但更多的是女性從事刺繡的報導。另一方面，近年一些研究指出至少在廣州、潮汕、杭州與北京，從事高階繡品生產的主力是男性。見楊堅平編，《潮繡抽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 19-20；金家虹，〈曾經的輝煌——宮廷繡〉，《浙江工藝美術》，2008 年第 3 期，頁 17-18；王文軒，〈慈禧繡莊今何在〉，《科學之友》，2008 年第 10 期，頁 91；楊茜，〈粵繡——男繡娘和鬥牛士的披風〉，《環球人文地理》，2012 年第 9 期，頁 25-31。與其將這些研究指出的現象與《申報》資料所見的矛盾視為後者資訊盲點的結果，進一步分析則可以見到，《申報》報導從事刺繡的女性，多半是在家用與閨閣脈絡下進行，與刺繡產業有關聯者幾乎絕無僅有。從產業的角度，刺繡脫離個人閒暇藝術實踐進入到專業範圍，意味著從業者的培養需要更多資源，更複雜且多層次的行業組織。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性別成為第一個從業篩選條件，則女性從業者的養成，無法與其他以男性為主的行業共享養成資源，造成養成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女性仍然肩負操持家事與養育幼兒的任務，培養專業女性從業者就會得到比

產業在內，刺繡是一個以女性爲主的實踐，這個從男性到女性刺繡行業的認知改變在何時發生？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議題。[43] 但農工商部繡工科全以女性爲教習、只收女生，則相當具有指標意義，顯示中國至少在 20 世紀初，已準備將女性生產力導向刺繡「產業」。1907 年〈女子小學堂章程〉列出女紅課程，可視爲對這個女性產業概念的呼應。

至於福壽美術館，「福」、「壽」兩字來自 1904 年慈禧太后御賜兩字。在沈壽去世後，由其夫出版的《余覺沈壽夫婦之南通痛史》中，余覺說：「光緒三十年，余公車報罷，乃爲妻進繡於清懿皇太后，蒙傳旨嘉獎，分賜福壽字」，同一書中附有「福壽繡品夫妻公司」商標圖，中文「福壽繡廠」，英文“FOU SOU SCREENS Co. MANNUFACTURERS OF EUROPEAN SCREENS PATRONIZED BY HER MAJESTY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這是將太后拉來背書，而且似乎瞄準的是國外市場；圖下書：「按余沈夫婦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並召入都同辦商部繡工科，蘇州公司即於是年休業，贊助該公司者爲劉柏生先生」。[44] 余覺的「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顯然有誤，由於福壽繡廠在余覺、沈壽同赴

較低的投資報酬。假設這個思考方式成立，則廣州、潮汕、杭州與北京的男性繡工將不會是特例。筆者在性別與職業的思考僅在普遍層次，參考兩篇對當代現象的研究，Celia Davies,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d the Profession of Gender,” *Sociology* 30:4 (November 1996), pp. 661-678；朱柔若，〈職場中的性別主流化：從性別統計看就業平等政策之成效〉，《城市發展》專刊（2010 年 10 月），頁 8-25。

43 可參考一篇對這個問題在 1920 年代的研究：李斌，〈社會性別與報刊中建構的刺繡印象——以 1920-1925 年《申報》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7 期 4（2010 年 7 月），頁 126-129。

44 余覺，《余覺沈壽夫婦之南通痛史》（上海：出版社不詳，1926）。

京師繡工廠這年停辦，因此可以推斷福壽繡廠在 1906 年底活動即已停止。[45] 和繡工科教習學生的送展品不同，福壽繡廠送展的兩件繡品都是寄售品，分別標價 100 與 300 元，但這也與生產外銷品的公司角色相符。回到前段所提的刺繡行業問題，若 20 世紀初中國的刺繡產業以男性爲主力，將女性引入這個產業，等於生產力的外加，意味著預設了一個超過內需的市場，因此繡工科聘福壽繡廠沈壽的理由便十分明顯。此外，在 1907 年將已經停辦的「繡廠」稱爲「美術館」，這個用詞饒富意味，但本文懸置這個問題。

女性藝術在藝術中的位置

最後一部分參展品爲三件以菊花、魚藻、荷花爲題材的繪畫，作者分別是金章與邱棱。放在今天的脈絡下，引人注意的不是這兩位女性畫家本人，而是她們赫赫有名的兄長與丈夫——「南吳北金」的金城。今天我們不知道這幾幅畫的風格形式如何，但可以金城作爲斟酌的起點。金城在 1905 年遊學歸國後，先任職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1906 年改仕北京農工商部。[46] 在其《畫學講義》下卷，金城說道：「余致力藝術三十餘年，自謂於花鳥一門少有心得，山水次之，人物又次之」。[47]《畫學講義》作於 1921 年，倒溯三十年，

45 劉凡，〈論沈壽對中國刺繡藝術的貢獻〉（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頁 37。

46 邱敏芳，〈金城繪畫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3），頁 21。

47 《畫學講義》是金城在 1921-1922 年間為教學需要所撰寫的教材，至 1927 年始於《湖社月刊》連載發表，見邱敏芳，〈金城繪畫研究〉，

1878 年生的金城，十歲就已經開始致力藝術，從三十餘年創作經驗歸納，花鳥、山水、人物這三個畫種是由易至難排列的。從 1921 年回溯十五年，1907 年的金城自認最擅長的是哪一種？最可能的還是花鳥，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金章與邱棱作品的門類，而金章日後也確實以魚藻聞名。另一個問題是，金城聲名大噪是 1920 年代前後的事，1907 年的金章與邱棱獲選，背後究竟是已有某種程度名聲的畫家金城？或是曾經有留洋經驗的農工商部司員金城？原因可能兼而有之，尤其金章也是一位曾隨三位兄長赴英國遊學的女畫家。[48] 這幾件繪畫是農工商部送展物品中，唯一不屬於刺繡類別的作品，如果推薦者沒有足夠的背書資本，很難想像被推薦者能被欣然採納，但這也使得金章與邱棱更像金城的分身。

回顧繡工科以沈壽爲首的刺繡作品。沈壽所送五件繡品名稱爲「山水士女、背面士女、四季花籃、笋魚、古瓶萱花」，其他副教習的繡品名稱也類似，如果沒有註明，單從名稱無法分辨是畫還是繡。張謇在《雪宧繡譜》序文中簡介中國刺繡史，說道：

> 世近有可說者，則上海顧氏露香園之繡。得其一幅者，往往列諸彝鼎，珍若璆壁。顧其法若何，士大夫所不能知也，雖能繡之女子，亦不必能說。[49]

頁 100；本段引文的後續為：「蓋花鳥章法簡易，且盆盎標本，到處可以取材，隨手拈來皆成妙諦，要在得勢而已。山水經營布置，既須妥貼，又須新穎，且重岡疊嶺，曲澗環溪，雖竭畢生之思，不能盡其妙，非僅一丘一壑之謂也。至於人物，一冠一帶，一髮一鬚，動合神情，攸關掌故，又非山水比矣。」筆者所閱讀的網路文本：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449935（2014 年 10 月 24 日檢索）。

48 邱敏芳，〈金城繪畫研究〉，頁 14-16。

49 沈壽述，張謇錄，《雪宧繡譜》（江蘇武進涉園重印版，1927）。

顧繡之所以在各家繡中脫穎而出，主要在以畫入繡。在這種情況下，繡作的優劣有極大程度取決於畫稿的選擇。士大夫所不能知的是，針法何以能使得刺繡如此肖似他們欣賞的繪畫，而能繡之女子即使知道也不必能說的是繪畫形色與針線形色間的轉換。繡工科的課程「繡藝之外兼習粗淺國文及圖畫」，粗淺國文是令繡工至少有基本文學素養，圖畫的目的則明顯地在於畫與繡的轉換。[50] 余覺在描述他與沈壽的夫妻關係時說：「余則以筆代針，吾妻則以針代筆；……針代筆針代顯，妻無余雖美弗彰。」[51]「以筆代針」是畫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畫將被轉換成繡，不要畫繡不出來的畫；「以針代筆」則是以針來畫一幅已經存在的畫，請注意：畫走在繡的前面。至於前引文的後一段，余覺以其妻之美而顯，沈壽以其夫之智而彰，這段話怎麼讀都是典型的郎才女貌，男在女前，智在美前。

幾乎可以說，像這樣的刺繡其最高境界是隱藏本身媒材的物質性，成爲繪畫的副本。繪畫所用的媒材是顏料，明暗漸層、色彩變換，原本就是顏料的性質；刺繡所用的媒材是色線，不換針改線，只能繡出單色點或短線色面，無法讓刺繡有如繪畫一般，呈現明暗漸層與色彩變換。以畫入繡的顧繡，所選的畫稿原本是畫，畫家根本不曾考慮畫是不是繡得出來，那是讓想要模仿繪畫的刺繡者去煩惱的事。一幅畫稿可以用來產生無數模仿繪畫的繡品，畫是繡的先決條件，但相反的情況卻不成立。在此，生產畫稿的都非出自女性之

50 〈實業．各省工藝彙誌〉，《東方雜誌》，卷 3 期 10（1906 年 11 月），頁 194。

51 余覺，《余覺沈壽夫婦之南通痛史》，頁 1。

手，她們的角色只是忠實複製畫稿。即使偶有畫稿出自女性畫家，也無法改變這個陳述，因爲不談性別，作爲刺繡範本的畫稿本身是繪畫，其比較對象是其他繪畫而不是刺繡作品。從歷史來考量，從沒有重要男性畫家的專長是爲刺繡作畫稿，更不用說女性畫家以刺繡畫稿在男性充斥的畫壇，與男性畫家一決雌雄。這種原件與副本的關係，類似西方藝術學院對素描（形體）與色彩優越性的論辯。簡單地說，在男性中心或唯心主義(idealism)的脈絡下，讓色彩有所依託的形狀、讓副本有所根據的原件，都具有更優越的地位。[52] 回到本文案例，中國以刺繡參展，當然是以 20 世紀初中國鼓勵女性投入實業爲主要著眼點，但就女性社會角色的轉變（或提升）而言，鼓勵女性與刺繡結合，其效應卻是相反地將女性坐實在男性從屬的位置。

上海萬國賽珍會：上海女界盛會

1907 年 5 月 23 至 25 日，「萬國賽珍會」在張園舉行。[53]

52 Richard Shiff, "Originality," in Robert S. Nelson & Richard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03-115.

53 原訂中曆 4 月 13、14 兩日（西曆 5 月 24、25 日），會前增加 4 月 12（5 月 23 日）一日，會後中方要求延長一日，但在最後一日，原有與租界洋人女性相關展覽已全撤離。見《申報》，〈上海將開萬國賽珍陳列會〉，廣告，1907 年 5 月 4 日，第 6 版；〈萬國賽珍陳列所加添十二日一天〉，廣告，1907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萬國賽珍會尾聲〉，1907 年 5 月 27 日，第 3 版；"The International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24 May 1907, pp. 483-485;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1 May 1907, p. 526.

這場展覽在時間上雖早於「梅勒本女工賽會」，但不僅起動時間晚，規模也小，然而在中國引起的迴響卻相反地大得多。原因之一是，「賽珍會」的名稱呼應了庚子後中國對博覽會的普遍興趣與正面評價；其次，沒有多少人遠赴澳洲觀展，但萬國賽珍會吸引了大量上海與其周邊民眾，連胡適也擠在張園的觀眾中。[54]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場展覽是純由女性主辦，相對於一般博覽會，長期以來「男性中心——女性邊緣」的性別角色結構，在此有一個暫時性的倒轉，中國如何面對挑戰或掌握機會的作為，便十分值得觀察；第三，從本文的角度，這場賽珍會不僅與前文的澳洲博覽會有諸多相似之處，在女性參與展覽的議題上，這個賽珍會也與日後的南洋勸業博覽會有密切的關聯。

《申報》刊載的〈序萬國賽珍會發起原由〉說：「茲由伊德夫人發起一萬國賽珍陳列會，我國數千年以來係第一次」。[55] 就名稱而論，此會確為中國之首次；如果以賽珍會為中國的博覽會，則此會亦為首次；如果如其名稱之一的萬國賽珍「陳列所」，則它也可算是中國第一批陳列所之一；但此會開辦之目的實為賑災，就助賑會而言，這便不是第一次了。《申報》上書畫助賑的報導，自 1870 年代中期起，便幾乎年年有之。助賑是一種很複雜的慈善、文化與經濟活動，與單純賑濟的差別，在於前者通常透過「物」來「助」賑，其形式是組織一個群聚社會空間，或將物品超值售出，

54 胡適，〈游萬國賽珍會感賦〉，舊詩存稿／1907 年，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冊 9，頁 7-9。

55 〈序萬國賽珍會發起原由〉，《申報》，1907 年 5 月 20 日，第 19 版。

或將難以定價的物品——如藝術品與展演——轉換成金錢，提供物品出售者與出錢購物者取得某種我們可以稱爲「慈善資本」——或稱功德——的對價，組織助賑會則從中取得賑災的資源。但除了助賑的性質外，這場萬國賽珍會有非常多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是展覽會的名稱與籌組方式。

《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報導這場展覽的名稱是"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ête"，亦稱之爲"Famine Fête"。Fair作市集、廟會解，也可以擴張成爲博覽會，Fancy Fair也是展覽的英文名稱中唯一指涉博覽會的，但Fancy一字在前，畢竟使得活動性質變得像園遊會；Fête則可解爲節慶或嘉年華會，"Famine Fête"明確指出了展覽的目的，即使歡樂嘉年華與悲慘災民的並列，構成一幅令人不自在的對照。相較於此，除了「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兼指助賑目的與博覽會外，其他名稱如「萬國賽珍會」、「萬國珍品陳列所」、「萬國賽珍陳列會」、「中國賽珍陳列會」、「萬國賽珍會中國陳列所」等無一不指涉博覽會。[56] 這個中英文名稱內涵的分歧與展覽推動者性別以及個別展示內容有關，容後再述。

《北華捷報》記錄了展覽籌畫的組織架構，主要的委員會成員如下：[57]

職務	人名	附註(筆者)
主席 president	Mrs. C. Montague Ede	保安公司經理伊德夫人
秘書 secretary	Mrs. Geoffrey Wheelock	Florence Ayscough 弟婦
	Mrs. Ayscough	Ayscough,Florence Wheelock[58] (?)

56 此展覽會的各種中文名稱散見本文各註腳，在此不一一羅列。

57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1 May 1907, p. 526.

58 Lindsay Shen, *Knowledge is Pleasure: Florence Ayscough in Shanghai*

	Madame Bagge	瑞典駐滬總領事阿里沙巴沙(Richard Bagge)夫人
	Madame Brodiansky	俄國駐滬副領事夫人
	Frau von Buri	德國駐滬總領事卜利(Paul von Buri)夫人
	Madame Eitaki	日本駐滬總領事永瀧久吉夫人
	Mrs. Hansen	挪威駐滬總領事瓦漢森(Thorvald Hansen)夫人
	Mrs. Hippisley	海關洋員 Alfred Hippisley 夫人(?)
	Mrs. E. Jenner Hogg	兆豐洋行經理霍克夫人
	Madame von Hirsch	奧匈帝國駐滬總領事 E. von Hirsch 夫人
	Madame Mencarini	江海關洋員綿嘉義(Juan Mencarini)夫人
	Madame Monaco	***
	Madame Potier	葡萄牙駐滬總領事 Oscar G. Potier 夫人
	Madame Ratard	法國駐滬總領事巨籟達(Louis Ratard)夫人
	Mrs. J. L. Scott	***
	Lady Sheng	盛宣懷夫人莊德華
	Mrs. Sheng Tun-ho	沈敦和夫人章蘭
	Madame Siffert	比利時駐滬總領事薛福德(Daniel Siffert)夫人
	Lady Souter	***
	Mrs. Murray Warner	美國工程師Murray Warner夫人[59]
	Miss Warren	英國駐滬總領事霍必瀾爵士之女(?)
司庫 treasurer	Mr. C. Montague Ede	保安公司經理伊德

上列名單包括了當時上海貴婦名媛，基本班底是各國領事夫人，除中國外，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俄國、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日本、蘇格蘭與愛爾蘭。但這也立刻讓人想到前文「梅勒本女工賽會」的組織方式：總委員會與層層下分的各級委員會，構成澳大利亞聯邦男性統治系統的夫人版副本，在上海洋貴婦的組織也是租界洋人社會權力結構——或至少是由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48.

59 Gertrude Bass Warner (1863-1951)，1904 年抵華，與美國工程師 Murray Warner 結婚，返美後協助 University of Oregon 建立亞洲研究課程，創立 Murray Warner Collection of Asian Art。見"Gertrude Bass Warner": http://library.uoregon.edu/speccoll/photo/warner/index.html（2014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租界男性主持的慈善事業——的鏡像。如果澳洲博覽會的女性主題支持了由女性來籌辦展覽的理由，在上海又是怎樣的理由動員了華洋貴婦們？

從展覽的英文名稱之一的"Famine Fête"、《申報》在 4 月 7 日刊登的〈萬國珍品陳列會先聲〉、5 月 4 日刊登的廣告〈上海將開萬國賽珍陳列會〉、5 月 21 日的論說〈論萬國賽珍會之有益〉所見，上海「萬國賽珍會」其實是自前一年底開始的華洋義賑會的延伸。[60] 這個以救濟華中水災爲目標的義賑會，於 1906 年 12 月 3 日開成立大會，英文名稱是The 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會議選出會長呂海寰、副會長盛宣懷與江海關稅務司好博遜(H. E. Hobson)、秘書李佳白(Dr. Gilbert Reid)、司庫伊德(Montague Ede)、執行委員會六位董事：沈敦和、朱葆三、陳彥清、李德立(E. S. Little)、伊德、海克思(Dr. John R. Hykes)，募款目標 25 萬元。從會議紀錄所見，與會者至少還有日本與英國駐滬總領事永瀧久吉與霍必瀾(Sir Pelham Warren)。次日，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選出執委會主席李德立，會中決議：具體措施除了國內勸募外，也尋求國際協助，包括要求時任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華董的沈敦和，聯繫國際紅十字會，[61] 以及所有駐滬總領事

60 〈萬國珍品陳列會先聲〉，《申報》，1907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上海將開萬國賽珍陳列會〉，廣告，《申報》，1907 年 5 月 4 日，第 6 版；〈論萬國賽珍會之有益〉，論說，《申報》，1907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61 關於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與沈敦和，見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1904 年－2003 年》（臺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2004）；楊智芳、周秋光，〈論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卷 35 期 4（2006 年 7 月），頁 115-121。

向各相關國家政府尋求金援。[62] 最後兩點值得注意，這個慈善事業在尋求國外協助時，跨出了傳教士的教會國際網絡，連結上如作爲國際人道組織的國際紅十字會，對本文而言，尤其重要的是總領事所屬的國際外交網絡。「萬國賽珍會」的籌辦主力，就是由華洋義賑會執委員兼司庫伊德的夫人所領軍的上海各國總領事夫人與各國僑界婦女，《北華捷報》也說賽珍會的成功，歸功於各總領事夫人。[63]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萬國賽珍會」正是婦女版的華洋義賑會，租界成功地組織了各國婦女參與公共事務，達成了可以與其丈夫父兄參與賑災勸募比擬的事業，也爲上海提供了一場視覺饗宴。

華界參與的雙門面性

如果將「萬國賽珍會」視爲慈善活動，有必要從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脈絡來觀察此事。中國近代慈善事業是一個已有相當多投入的研究領域，與本文較有關係的是華洋合作的

62 "The 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The North-China Herald*, 7 December 1906, pp. 540-542;〈華洋義賑善會開第一次成立會〉，《申報》，1906 年 12 月 5 日，第 17 版。《申報》的報導似由西報翻譯，將兩日會議混合為一，且誤以盛宣懷為會長之一。本文所述的伊德，在此報導中稱為意德。關於義賑會在 1906 年底的其他活動，見"The 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The North-China Herald*, 14 December 1906, pp. 606-609, 630-631; 21 December 1906, pp. 665-666; 28 December 1906, p. 730.

63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1 May 1907, p. 527, "The success of the Fête was assured when the ladies of the several Consulates accorded it their active support."

慈善事業。[64]《申報》論說稱「萬國賽珍會」有三善，第一善便是華洋合作：

> 吾國自通商以來，外國之來華者日眾，門戶既闢，猜忌日深。內地居民見聞狹隘，一見外人，咸以異類目之，因此之故，致仇教之事日出不已。雖有善者，亦無由自明。今伊德君夫婦創為此會，以拯災黎，俾吾國民知旅華外人中尚有熱心善舉如此者。嫌忌既消，邦交自固。我疆我理曾無鄭鄙之猜，無詐無虞永踐秦王之約。[65]

在「萬國賽珍會」前，已經有幾次華洋合作的慈善與社會工作經驗。例如，1904 年成立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前述 1906 年底的華洋義賑會，以及約在同時轉交華人辦理的上海天足會。盛宣懷在前二個合作案中舉足輕重，沈敦和則可說是無役不與。如果華洋義賑會是華洋男性合作的成果，作爲其女性副本的「萬國賽珍會」，缺少了華界婦女便是難以彌補的缺憾。即使如此，在「萬國賽珍會」的國際委員會中，盛宣懷夫人（莊德華）與沈敦和夫人（章蘭）兩人廁身其中，

---

64 就普遍研究層面，見曾桂林，〈近 20 年來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147-160；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頁 6-13；郭常英、岳鵬星，〈近六年來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評〉，《中州學刊》，2014 年第 10 期，頁 136-141。關於 1906 年水災賑濟，見池子華、馮欣，〈近代中國災荒及其救濟〉，《文化學刊》，2009 年第 2 期，頁 67-73；樊超杰，〈光緒三十二年蘇北水災賑濟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65 〈論萬國賽珍會之有益〉，論說，《申報》，1907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仍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可以視之爲中國女性參與「國際組織」的早期案例。在「萬國賽珍會」籌畫階段，《申報》在 4 月 7 日報導道：

> 歐美風俗遇有慈善籌款，輒舉行珍品陳列，所經紀其事者，必尊如皇后、妃嬪、貴爵夫人，始克充選，其資望稍遜者，皆不得預，固極一時之慎重也。然從未有合萬國之力而為之者。本屆淮徐海各屬水災，各國官商夫人因見中國風氣漸開，女界文明進步，遂有舉辦萬國珍品陳列所之議，以開先導。……公推盛宮保夫人主席，沈仲禮觀察夫人為經理。[66]

這場會議的參與者似乎只有華洋各夫人們，但從澳洲博覽會的例子來推想，如果她們的丈夫沒有先同意提供後續協助，難以想像這樣的會開得起來。各國官商夫人之所以推舉出兩人，顯然一是從西俗，以貴婦任之，二是雙方的丈夫們已經有慈善合作的經驗與成果，三是她們必然認爲中國女界文明進步的程度，已經容許中國貴婦和洋貴婦一樣程度的社會參與，或至少洋貴婦們已經從她們的丈夫得知中國貴婦的丈夫不會反對。盛、沈兩位夫人分任的主席與經理必然與她們的慈善家丈夫有關，但這則《申報》報導中，兩人分任的顯然不是前文所述的國際委員會主席與經理，而是針對中國方面的另一個次級委員會。

在幾乎純女性的國際委員會中，主席伊德夫人的丈夫擔任司庫。作爲委員會中唯一的男性，他看起來全然是個異質元素。1907 年 6 月，伊德離滬赴港，上海華洋紳商爲伊德餞行，沈敦和發表感謝詞，讚揚他在 1906 義賑會與 1907「萬

---

[66] 〈萬國珍品陳列會先聲〉，《申報》，1907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

國賽珍會」中的重要貢獻。[67] 從這個角度，伊德夫婦在「萬國賽珍會」委員會中首尾呼應似乎也算合理。「萬國賽珍會」結束後次日，《北華捷報》報導中估計此會可爲賑災基金(Famine Fund)帶來 60,000 元的收入，[68] 沈敦和則在 6 月 9 日在《申報》上公布萬國賽珍會中國方面的售款報告：「綜計男、女兩陳列所合共售洋 11,388.96 元，均已如數解交華洋義賑會伊德君彙解災區」。[69] 除了再次說明了「萬國賽珍會」與華洋義賑會的連續性外，我們也立刻發現「萬國賽珍會」的籌劃分華洋兩邊進行，而且和洋人不同的是，在中方還再分男、女賓兩陳列所，對照這個「女界」賽珍會中並沒有男性洋人主持的展覽攤位，中國的男賓陳列所反而變得和全女性的委員會中只有伊德一位男性一樣怪異。

從另一個角度看伊德列名委員會的緣由，我們可以稱之爲展覽的華洋雙門面。比較中西文報紙上出現的資料，《北華捷報》與前述 4 月 7 日的《申報》報導中國方面代表是盛、沈兩位夫人，但是《申報》上其餘的報導、廣告、致謝等所有以中國人爲對象的文字發布，全都是由中國男性出面的。檢視開幕前三天登載於《申報》上的〈序萬國賽珍會發起原由〉，通篇四分之三講的都是前一年底的華洋義賑善會與伊德，雖說賽珍會由伊德夫人發起，但「所有一切陳設均係伊德先生偕其夫人親自指點布置」、「足見伊德先生暨其夫人爲我華人費盡心機，不厭煩瑣，實係不可多得之大善士」（底

67 〈公餞西商誌盛〉，《申報》，1907 年 6 月 23 日，第 19 版。

68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1 May 1907, p. 527.

69 〈萬國賽珍會中國陳列所售款報告〉，《申報》，1907 年 6 月 9 日，第 5 版。

線為筆者所加），有如伊德夫人只是丈夫的配飾一般。文章最後「敬代災黎叩首」的是沈敦和、周金箴、陳彥清、印錫璋、朱葆三、李雲書、蘇葆笙、邵琴濤等上海商界與慈善名人，反倒是「萬國珍品陳列所」主席盛夫人、經理沈夫人皆未列名其中。[70] 從事件發展時序來看，似乎中國在 1907 年 4 月初決定加入，但當時名正言順的只有女性。至 4 月底加碼成「萬國賽珍會」，此時才出現男性與較多的報載消息。換言之，中國男性是以搭便車的方式加入。男性而附女性之驥尾，這可是數千年來難得一見之事。有男性加入的最大好處，是連帶地使得女性的可見度大幅提升。

整體而言，因為中國男性沒有加入的名義，而當中國面向洋人時以盛、沈二夫人代表，但面向華人則回到由男性發聲，在在顯示中國男人只聽男人的。伊德之所以在委員會中，看來反而像是為中國保留一個和中國男性對話的窗口。

中國女界參與的資本

《申報》上除了「萬國賽珍會」外，還有其他稱謂，隨報導或廣告脈絡有「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萬國珍品陳列所」、「萬國賽珍陳列會」、「中國賽珍陳列會」、「萬國賽珍會中國陳列所」等。沈敦和在會後刊登在《申報》上的致謝啓事中，先說明了「萬國賽珍會」由伊德夫人發起的緣由後，說道：

敦和以西商既具救災恤鄰之志，我國豈能默默無聞，

---

70 〈序萬國賽珍會發起原由〉，《申報》，1907 年 5 月 20 日，第 19 版。

> 爰創設中國陳列所，蓋列於萬國賽珍之一部分，慘澹經營，閱時半載，始得規模略具。[71]

由此觀之，中國方面參加「萬國賽珍會」的主要推手是沈敦和，盛、沈兩位夫人變成與租界洋貴婦交涉的白手套，而各種陳列所、陳列會與「萬國賽珍會」的相對關係，也變得明朗。綜合《申報》上各與「萬國賽珍會」相關的布告廣告，其文字率皆出於沈敦和之手。例如，《申報》在四月底刊載了〈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簡章〉，其前言如下：

> 本會與萬國賽珍會及博覽會略似，實為女界特別之大會，亦門寶惟一之鉅觀，各國會員踴躍奔走，函電絡繹。陳列各品悉從海外運來，必為華人所從來未見者，始得預選，以故殫精竭慮，自去冬迄今，累五月之久，乃克齊備。吾中國既為主中之主，尤宜窮工極巧，五光十色，洋洋乎萃一時之大觀，凡稍形窳敗之品，概從屏絕，蓋中國工藝之精神將於是乎借鏡，固不僅為斯會增色而已（底線為筆者所加）。[72]

類似的文字也出現在一週後《申報》登載的萬國賽珍會廣告中。[73] 這份簡章目的在徵集展品，一開始就將「萬國賽珍會」定位在博覽會的層級，而且中國在這場展覽中不僅是地主國，展覽目的也在賑濟中國災民，是爲「主中之主」，尤應勉力從事，務求盡美，而不僅是爲華洋合辦的賽珍會增

---

71 〈萬國賽珍會中國陳列所報告開會情形並誌謝贊助諸同志〉，《申報》，1907 年 5 月 31 日，第 6 版。

72 〈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簡章〉，《申報》，1907 年 4 月 28 日，第 10 版。

73 〈上海將開萬國賽珍陳列會〉，廣告，《申報》，1907 年 5 月 4 日，第 6 版。

色而已，因爲女界形象胥賴，國家門面是倚。但如果「萬國賽珍會」關鍵如此重大，我們就難以理解爲何洋貴婦們從前一年底（亦即自華洋義賑會起）已連續努力五個月，中國與中國女界卻在距離開幕僅剩 25 天才啓動？雖然沈敦和在五月底會後的謝詞中說，中國陳列所在「萬國賽珍會」開幕前已經營了半年（亦即與「萬國賽珍會」國際委員會同），但我們可以合理懷疑，中國參與「萬國賽珍會」的決定，不會早於刊登徵集簡章的 4 月 28 日太多。因爲像這種規模的事務，一旦決定，就必須立刻行動，沒有理由拖到展覽開幕前 25 天，才倉促行事。但無論是出自伊德夫人邀約，或沈敦和主動建議，要參加這個租界洋貴婦組織活動的條件是必須有一個相應的中國女界。於是，問題便是在 4 月，有甚麼契機讓沈敦和發覺到中國女界有參與的資本？我們立刻想到同一時間進行的「梅勒本女工賽會」徵件。

回顧本文前節，農工商部在 1907 年 3 月 26 日接到外務部轉知的邀請後，4 月 10 日咨呈外務部稱，已知照各省商會及女工廠。[74] 農工商部札商務總會文在 5 月 5 日登上《申報》，不排除商務總會更早就接到札文。[75] 但上海商務總會回覆農工商部稱，沈敦和在札文之前，已「接梅勒本女美術會書記員電請爲該會駐滬招來員，業將天足會製就之件一併逕寄賽會開單」，[76] 若估計從接到通知、準備參展品再寄出的時間，可以推測澳洲博覽會委員會與沈敦和至少在 4 月即

[7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3。

[75] 〈農工商部札商務總會文〉，《申報》，1907 年 5 月 5 日，第 20 版。

[7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02-20-001-02-009-049～053。

已聯繫上。上海天足會由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率領的一群洋貴婦，於 1895 年 4 月成立，至 1906 年轉交華人經營，新會長正是沈敦和。[77] 即使新會長是一位中國男性，暴露了中國女性缺少公共事務經驗的窘境，我們仍須留意到原始團體是一個以女性爲主的組織，這個性質極有可能是澳洲博覽會與上海天足會接觸的主因。但是，單單天足會不足恃，重要的是 1905 年即已創辦的天足會女學堂，[78] 而此刻學堂校長恰巧是沈敦和夫人章蘭。[79]《申報》登載的萬國賽珍會廣告中說：「歐美籌賑無法不備，慈善社員往往舍其家珍，手製珍品陳列待價，更設娛賓雜戲，以鼓舞興會」，[80] 這個辦法的後半段正是學堂女學生可以做的事，而學生的手製珍品與

---

77 苗延威，〈晚清寓華「洋貴婦」的社會參與——以上海天足會(1895-1906)為中心的探討〉，頁 129-167；〈華人接辦西女士所創之天足會〉，《申報》，1906 年 11 月 27 日，第 10 版。

78 〈天足會創辦學堂〉，《申報》，1905 年 3 月 19 日，第 5 版。

79 〈江蘇學政考查上海各校分別等第表（續）〉，《申報》，1906 年 5 月 28 日，第 4 版。在江蘇學政唐景崇對上海各女學堂的考察，天足會女學堂「校長章蘭管理規則整肅嚴明，此校科學固有特色尤重德育根柢」。關於章蘭的史料不多，見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chapter 'Prominent Chinese Residents', 'His Excellency Shen Tun-Ho', p. 530. 樂童、孝娥，〈追述沈仲禮君之家庭〉，原載《婦女旬刊》，期 91(1922)，收入孫善根編著，《中國紅十字運動奠基人沈敦和年譜長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 257，「公名敦和，浙江寧波人，其夫人樂氏，大雅春風，極能容物。……公之二夫人章氏，博學多才，曾為天足會會長，某女校校董，與親戚相周旋圓轉如意，長於應對，侍理家政，不愧謂賢內助，惜天不永年，未享上壽。」

80 〈上海將開萬國賽珍陳列會〉，廣告，《申報》，1907 年 5 月 4 日，第 6 版。

澳洲博覽會主題若合符節，也確實被送去展覽。易言之，我們有充分理由推測澳洲博覽會提醒了沈敦和他手上握有怎樣的資源，可以用在澳洲博覽會的，同樣也可以用在上海「萬國賽珍會」，而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參與的徵件簡章遲至 4 月底才見報。

物品與性別

就「萬國賽珍會」的中國徵件方式與內容，可以參考〈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簡章〉。參加的方式有四種：一、捐助之品物（直接捐物品）；二、捐款購物（由辦事處代購品物標明價目，並貼某某人助）；三、定備之品物（開送底價，由辦事處代為預訂）；四、寄售之品物。這幾種參加方式設定了一個必須從「物」通過的管道，排除了直接捐款，而究竟有甚麼是可以讓此會稱得上女界特別之大會，則必須從展品觀察。簡章中列出了將陳列的物品，可以歸納為下列數類：

1. 美術類：包括定備品物的綢緞鋪、簪扇鋪、廣東紫檀雕刻木器等類、象牙雕器，嘉定竹刻等物、寧波嵌牙紅木器類，以及廣東銀器。
2. 瓷器與琺瑯器：包括古瓷、新瓷與景泰窯器類。
3. 銅器。
4. 各種扇類、綢緞與茶類。
5. 古人與時人花卉條幅類。
6. 顧繡類與女紅美術類。

這個分類並不十分有系統。例如，上列的第 2 與第 3 類其實也可以放在美術類之下。在這份 4 月 28 日發布的簡章

中，同時也宣布了一些已經備妥的展品，包括盛宣懷捐助的古人花卉條幅百件、古瓷一批、盛夫人與商會購助以及天足會學堂代備特別新樣繡品一批、沈敦和捐助的古玩與「北京所做之耍物類」。在本文的脈絡下，值得注意的展品有兩類。首先，與女性參與展覽性質相符的主要是顧繡類與女紅美術類，其中前者令人想到「梅勒本女工賽會」中北京繡工科的送展品；後一類包括花邊桌毯、披肩領條、各種像生花（梅花、洋玫瑰、牡丹、菊花、蠟梅、香水花、荷花）以及像生果品，在日後南洋勸業博覽會中將大量出現，在此，這一類物品都是天足會女學生手製，是否也和沈敦和以天足會名義寄到澳洲的展品一樣？可以推測，但無從得知。其次，在時人花卉條幅類之下註明須「足四尺長。凡花鳥草蟲，或用淡湖綾裱，或用白綾裱，人物、山水、書法皆不合選」。爲何有這個排除條款？在簡章開單羅列的最後說明了：「以上單開各品物均爲西國士女所樂購」。[81] 如此看來，山水、人物與書法是西國女士們沒有興趣的種類，而花鳥草蟲則被認爲在女性藝術實踐的範圍內。[82] 這也立刻令人再度聯想起中國參加「梅勒本女工賽會」時，繪畫類只有金章與邱棱的花鳥畫。另一方面，只鎖定西國女士，也令人懷疑「萬國賽珍會」的原始委員會是否一開始並未準備將中國觀眾設定在開放對象內。

自 5 月起，中國籌備單位以「萬國賽珍陳列會」和「中

---

[81] 〈中國賑濟珍品陳列所簡章〉，《申報》，1907 年 4 月 28 日，第 10 版。

[82] Sam George, "Linnaeus in Lette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emale Mind: 'Botany in an English Dress',"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8:1 (Spring 2005), pp. 1-18.

國賽珍陳列會」名義刊登了多次贈物致謝，列出贈物人名與物件清單，總共八次，部分致謝啓事重複刊登，筆者查閱了《申報》自 5 月 15 日起刊登的第二以及第四至第八次致謝清單。大致說來，從生產者性別的角度，如果我們將磁器、銅器、木雕家具等工藝品當作具有男性屬性的物品，將繡品與女紅美術類當作具有女性屬性的物品，則男性捐贈的多半爲前一類物品，雖然也有捐款購繡貨者，例如第二次贈物致謝就記錄到商會經募奚朗如君助九八規元 200 兩計購繡貨 50 件、孫綸甫君助洋 200 元計購繡貨 34 件、金業公所助洋 200 元計購繡貨 33 件、西幫匯業公所助洋 100 元計購繡貨 23 件，合計即已有 140 件繡貨。[83] 相對地，女性贈物間有屬於第一類者，但更多的是第二類的繡品與女紅美術品，後一類包括大量的鈕子花、像生花、錦片花、像生果。

從六次贈物致謝清單統計，如果捐一件算一次，則男女性捐助人次約略相當，但第二類物品數量是第一類的兩倍半。數量當然只是事實的片面，例如上海道臺瑞澂捐了 10 件瓷器值 1,200 元，[84]《北華捷報》報導，端方一人便捐了值 5,000 元的各種器物，[85] 而像生花、鈕子花之類估計價值約 1 元上下。[86] 另一方面，如果男性和女性捐贈者之中都有

---

83 〈萬國賽珍陳列所收物致謝〉，《申報》，1907 年 5 月 15 日，第 9 版。

84 〈中國賽珍陳列會贈物誌謝〉，《申報》，1907 年 5 月 30 日，第 5 版。

85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1 May 1907, p. 526.

86 張春帆，《九尾龜》（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第 1 集，第 188 回，「過了一天，恰恰的張園賽珍會已經開場。貢春樹和劉仰正兩個，少不得也要買兩張入場券進園遊覽。貢春樹剛剛走進園門，早見一個

捐購繡品者，男性幾乎不是直接捐物就是捐錢助購，我們很難想像這些繡品是他們自己繡的。相反地，有些繡品出自捐贈女性之手，而大量像生花之屬，則幾無例外全爲女性手作。例如，天足會女學堂在第四、五次清單中，一次就捐了像生花 100 支、像生果 30 籃、繡工物一批。[87] 整體而言，男性捐賑物品多爲出自專業工匠的高價工藝品，這些物件在商品市場上有可資遵循的行情，無論物品的（男性）生產者與消費者都處於較高的社會位階。女性捐賑物品則有如家庭手工，所需經濟與職能資本門檻相對低，她們是低階生產者，顯示女性閒置人力開始被動員的初始狀態。

像生花、鈕子花、錦片花應該都是今稱的人造花，作法來自日本。除了第六、七、八次清單中列出有日本太田綠女士自造像生花 9 支外，沈敦和在結束後的開會報告中說：「逮（迨）開會之第三日，又承遊學東京煉石女士燕斌邀同留東各女士出自製美術品曰八十件，寄到雖爲時已遲，幸所助皆精品，尚能銷售」。[88] 在此，女性工藝品似乎可分爲兩類：一爲舊式傳統刺繡，這種勞力密集又趨向服膺原件的複製，

十六七歲的麗人濃妝豔抹的，手中提著滿滿的一籃花，裊裊婷婷的迎將上來，對著貢春樹嫣然一笑，在籃裡頭取出一朵花來，對貢春樹道：『請買一朵花，盡個同胞的義務。』貢春樹被他說了這一句，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連忙把那麗人手中的花接了過去，扣在鈕釦上。那麗人微微一笑，又照樣的取了一朵來，遞給劉仰正。劉仰正也接了。貢春樹便取出兩塊錢來，交在那麗人手內。」

87 〈中國賽珍陳列會贈物誌謝〉，《申報》，1907 年 5 月 30 日，第 5 版。

88 〈中國賽珍陳列會贈物誌謝〉，《申報》，1907 年 6 月 1 日，第 23 版；〈萬國賽珍會中國陳列所報告開會情形並誌謝贊助諸同志〉，《申報》，1907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

將會使女性維持被限制在傳統性別角色之下。另一類則爲與作爲文明事業的學堂結合的新式女紅，雖然瑣細，但將構成女學堂女紅長期的主要內容。筆者的論點是，放在學堂內，女學生也不會一直只作這些零碎物件，學堂還有很多可以學的，而後者是最後使得女性獲取可與男性競爭能力的主要管道。此外，若與「梅勒本女工賽會」的中國參展品比較，第二類新式女紅的加入，顯示提升國家生產力與新式教育的關聯。但是，動員女性是要付出代價的。

視覺饗宴？敗壞風化？振興產業？

本文所謂的視覺饗宴包含兩個部分：展出與義賣的物品，以及擔任會場服務的女性。從當時上海報紙的報導，可以大致拼湊出會場情形。主陳列所在張園主建物安塏第 (Arcadia Hall)，根據《申報》對「萬國賽珍會」第二日的報導：

> 入會後，即至中國陳列男所謁沈仲禮君。……縱觀所內陳列各物，以繡貨、綢緞、磁器為大宗，餘係字畫及各種美術。……繼至女陳列所，承沈仲禮夫人導觀，中有天足會女學生所製之像生花及水菓等，並有九和綢莊用綢紮成之綵，其他如裝鳥、繡貨等亦屬可觀。當有所中女士請略購貨物，以盡義務，乃出資三元，購菊花一盆以為紀念。復至安塏第，係各國陳列所，計十五國，又有一相聯者為萬國商店門口。[89]

對照《北華捷報》、《申報》所稱的中國陳列男所，位

[89] 〈第二日萬國賽珍會紀事〉，《申報》，1907 年 5 月 25 日，第 5 版。

於入口不遠處中餐館（下文《九尾龜》中的老洋房）內，女陳列所則在安塏第入口左側，各國陳列所在門廳再入內的大廳內，亦即賽珍會的女性主體部分，不分華洋皆集中在主建物中，男性展區則發配到較邊緣的位置。但即使就女性展區而言，這樣的格局仍是一邊萬國，一邊中國。張春帆的《九尾龜》對此有更生動的描述：

> 兩個人慢慢的走到安塏第來，只見那安塏第中間陳列著許多東西，都是些泰西士女在那裡四處兜攬生意的。那安塏第的兩旁隔作十幾處，好像是十數間廂房的一般，卻是十三國領事的夫人分釐列貨的在那裡掌櫃。安塏第的前後，又有許多歐美各國的女士，也有設著博彩攤的，也有賣點心食物的，大半都是些少年貌美的人，一個個都打扮得金鑽照眼，錦繡流光。兩人一路走來，東看看，西看看，真有些應接不暇的光景。出了安塏第，又到老洋房去看了一回，都是陳設的珠玉繡貨、古玩字畫，陳設得五光十色，光怪陸離。[90]

由以上文字可以歸納出有點諷刺的現實：前述六類展品中比較高價的前五類，多集中在作爲配角的男性中國陳列所。稱得上珍品者主要是由中國男性提供的，因此賽珍會、珍品陳列所之類的中文名稱，主要對應男性提供的展品，在中國男性主導展覽對華門面的狀況下，這些珍品撐起園遊會中的博覽會。可以說，女性辦園遊會，男性辦博覽會，但園遊會放中間，博覽會擺旁邊，如非這是一場以女性爲主角的展覽，豈容得這種中心／邊緣倒轉的事發生？從《北華捷報》，我們可以清點洋貴婦們展售怎樣的物品：室外花園中

90　張春帆，《九尾龜》，第 188 回，頁 1174-1175。

有日本茶室、瑞典香煙甜點、丹麥與日本啤酒、挪威飲料，進到安塏第，美國攤賣糖果，仿造雪維亞(Seville)老市區一角的西班牙攤賣扇子，英國攤賣兒童用品，德國、蘇格蘭與愛爾蘭攤位則提供包括肥皂、香精等各種今天可能列在百元店的小物件(fancy goods)，可見並不是只有華界婦女才提供像生花、鈕子花之類的低價商品。如果沒有中國男性主導的高價藝品「擾亂」，這場賽珍會幾乎可以稱之爲上海萬國女工賽會。

從這些低價的勸賑商品可以期望多大的收入？大凡激發購買慾的途徑有二：一是商品本身的吸引力，二是包括商品販售者在內的販賣情境。套句記號學的說法，在恰當的情境下，幾乎所有人都會付出任何價錢購買幾乎任何東西。張園會場內，除了一般張燈結綵的布置外，各國女性皆身著歐陸各地傳統服裝（美國與日本例外），爲展覽平添異國色彩。其他分置園內各區的餘興雜耍(side-shows)、遊船酒吧、射擊釣魚、照相摸彩、埃及木乃伊、[91] 電影演劇、黑面歌舞秀(the nigger minstrels)和夜間煙火等，[92] 都屬於本文所謂販售情境打造的一部分，尤其當展售物品的是「十六七歲……濃妝豔抹，……裊裊婷婷迎將上來」的麗人、「歐美各國的女士……打扮得金鑽照眼，錦繡流光」、少年貌美的人，[93] 這些全是

---

91 “The International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24 May 1907, p. 485. “The Egyptian mummies were on view in a tent near the bar, and their curator seemed most anxious as to the effect of heat on her charge”.

92 “The International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24 May 1907, p. 485.

93 張春帆，《九尾龜》，第 188 回，頁 1175。

美麗的女性，反而爲這場慈善會增加了幾絲道德疑慮：使助賑會成功的大量人潮究竟是來買東西？還是看賣東西的人？看其他來買東西的人？看其他來看別人買東西的人？看其他來看賣東西人的人？

本文是否有誇大視覺饗宴中女性被物化的嫌疑？張春帆的《九尾龜》中描述「萬國賽珍會」的章回出版於 1910 年，小說中說道，主其事者是商約大臣陳寅孫宮保和單名一個「厚」字的孫伯義觀察，這幾乎連婉轉影射都省了，赤裸裸地指向盛杏蓀（宣懷）與沈仲禮（敦和）。有些接近毀謗沈敦和的描述並未遭到沈的反訴，一方面暗示了當事人避免瘡疤越揭越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小說描述事實的可信度。在此摘錄《九尾龜》中一段時人對賽珍會的反應：

> ……說到這一次賽珍會的事情來，王子淵王太史氣忿忿的道：「好好的一個慈善會，如今弄成了一個大台基，還不如不開這個會，還覺得乾淨些兒。」秋谷聽了道：「老伯這個意見卻錯了。這個賽珍會雖然被他們弄成了個大台基，卻究竟那班饑民還得些實惠。」王子深王太史聽了，搖一搖頭道：「照你這樣的說起來，這些敗壞風化的舉動都是應該的了？據我看來，賑濟饑民的事小，不過患在一時；敗壞風化的事大，卻是患在久遠。兩下裡比較起來，究竟有些輕重的分別。」秋谷道：「老伯的話自然不錯，卻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海這個地方本來是風俗狠壞的，就是沒有這個賽珍會，依然也是這個樣兒，並不是開了這個賽珍會方才敗壞風化的。不開這個會，風俗未見得就會變好；開了這個會，卻實實的在災民身上有些

益處。這樣的比較起來，還是賑濟饑民的事情來得重些。兩位老伯以為何如？」[94]

相較於《申報》與《北華捷報》上的正面報導，以上言論，固然可以視之爲一般狹邪小說中用來增加戲劇張力的衛道段子，但即使作爲談資，也要有可以借題發揮的材料。「台基」是借留男女私下交往幽會之處，[95] 敗壞風化之說，直指「萬國賽珍會」媒介色情。值得考慮的是，衛道之士並不是沒有性別的，引發他們疑慮的是具有誘惑力的年輕女性，而會場的歡樂氣氛無疑有推波助瀾之效。如果敗壞風化是太過沉重的指責，多個賽珍會上海風俗不會更差，少了賽珍會也不會更好，不如說上海風俗夠壞，才能有賽珍會出現的空間，這個「壞」看起來倒不全然眞是壞事。

將風俗好壞的關鍵全在放在女性身上，著實刻薄沙文，本文在此僅聚焦在「萬國賽珍會」中兩個與婦女地位改變有關的面向，首先是關於天足會與天足會女學堂。長久以來，天足會或不纏足會是一個吸引學界注意的研究議題。[96] 但天足會主要是一個藉著演說與文宣，鼓吹中國女性不纏足的組織，其成員有兩類：一是西洋貴婦與教會，二是開明進步的

94 張春帆，《九尾龜》，第 191 回，頁 1195-1196。

95 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 484-499。

96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期 16（1991 年 8 月），頁 139-180；張鳴，〈男人的不纏足運動〉，《二十一世紀》，期 46（1998 年 4 月），頁 60-69；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頁 77-82；楊興梅，《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中國男性，被放足的女性在其中則幾乎少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97] 第一類西洋貴婦與賽珍會委員會類似，第二類則在這場以女性爲主的賽珍會中，師出無名，他們若不是扮演非直接行動的贊助者角色，[98] 就是在賽珍會中也進不了張園安塏第。若非天足會女學堂，盛宣懷夫人與沈敦和夫人在這種需要女性人力的事業，將落入有將無兵的窘境，根本不用再談任何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問題，可以說「萬國賽珍會」提供了中國女界一個進入公共空間的縫隙，而女學堂則構成進入這個空間的資本。

天足會鼓勵不纏足，但將圈養動物野放，還必須考慮回歸自然（或野蠻）環境後的動物是否具備生存能力，放足以後的女學堂教育因此就是其邏輯後續。天足會女學堂是當時上海諸多女學堂之一，這些學堂多半強調學生畢業後自立的職業養成。[99]「萬國賽珍會」中人與物中西同陳，與女性相關的工藝新舊並列，便連接到鼓勵實業的工商博覽會面向。《申報》記者對賽珍會的最後感想如下：

> 中國珍品若磁器、繡貨，物非不美，然陳陳相因，不

---

97 舉例而言，上海天足會沈敦和在 1905 年 8 月從日本訂製了一批天足會佩章，目的是「尋常不纏足者顯分區別」，這意味著若沒有佩章，不纏足的天足會女生會有被認為是沒知識的鄉下大腳姑娘的可能，佩章則讓她們有切斷天足與社會地位低下的鏈接，並訴求一種比富貴之家小腳更高的開明大腳。見〈天足會佩章到滬〉，《申報》，1905 年 8 月 29 日，第 4 版。

98 萬國賽珍會誌謝中西扶助諸君〉，《申報》，1907 年 6 月 8 日，第 5 版；"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e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May 31, p. 526，見"Patrons"與"sub-committee"欄。

99 〈初七日唐學使視學詳情〉，《申報》，1906 年 5 月 2 日，第 17 版；〈江蘇學政考查上海各校分別等第表（續）〉，《申報》，1906 年 5 月 28 日，第 4 版。

> 能別出新樣，彼國雖一小皮夾、小鏡架，亦必日新月異，光怪動人，則觀者又宜有改良工商業□。□是論之，此會雖為災振〔災賑〕而設，即謂與中國前途有關係，為吾國博覽會之先聲，焉無不可也。[100]

在與外國產品當場比較之下，中國傳統工藝不可謂不美，但作爲產業卻是大不善，缺點在不能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但這個缺點的發現得利於展覽空間的打開。而如同前文所述，即使「萬國賽珍會」以女性爲主角，女性在中國珍品中的角色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中國女性開始加入，推陳出新，不僅在產品的新，尤其在生產模式的新。「萬國賽珍會」由租界西人婦女發起，中國女界因而得到展開其社會實踐空間的機會，而作爲中國博覽會的先聲，即使在操作面上仍然大量仰賴男性，這個先聲由中國女界發出則更富意義。萬國賽珍會熱鬧了三天（或接納中國觀眾的四天），但展覽之用已爲大眾認知，從次年起，各種展覽與陳列所一路長紅到 1910 年的南洋勸業博覽會。

結　語

上述這兩場 1907 年的展覽，對中國女性藝術活動的社會化無疑深具啓動意義。從更廣的角度也可以說，藝術提供了女性一個有效的社會參與入口，使得女性在性別角色社會定位的議題上，獲得了更多的發言權，但權力的取得很少是無對價的，更多的權力也相對於更多的付出。另一方面，這

---

100 〈萬國賽珍會第三日紀事〉，《申報》，1907 年 5 月 26 日，第 4-5 版。

兩場展覽之所以具有啓動效應，尤其在於同樣性質的活動在日後持續出現，不斷激盪擴大，例如 1910 年南洋勸業博覽會中女性的廣泛參與。

但是所有的觀察者都不得不承認，不論從實體或社會空間，兩個事件中一個源自於澳洲女性萬國博覽會的邀請，另一個則肇因於上海租界洋貴婦們意圖複製她們丈夫的慈善活動，都不是由中國啓動的。如果不是中國處於掌權階級的男性協助——或至少暗許，中國女性和過去一樣得不到上臺的機會。男性中國（或中國男性）不得不正面回應梅勒本女工賽會的邀請，否則一方面與庚子新政後藉博覽會促進工商的策略產生矛盾，也與 1903 派團參觀日本博覽會、1904 年參加聖路易博覽會的邏輯出現斷裂；另一方面，則等於否定了包括兩年前農工商部成立繡工科在內將女性納入的實業建設。同樣地，爲了賑濟中國災民，租界洋貴婦們都已經放下身段，上海的中國慈善事業界若不動員其婦女界，反倒顯得本國人對自家災黎無動於衷。

一動心轉念就生意圖。但是，不要說意圖不必然導出預期結果，有行動意志也不等於有行動能力。幾乎可以說，男性中國（或中國男性）在這場與外國的接觸中，突然發現挑戰出現在自己的防線缺口前：中國被限制要求回應的是女性生產者與其產品。在中國推動新政初期，以男性爲主力的軍隊自不用說，在性別限制理由不必然明顯的工商業與教育，也大都只設想了男性。同樣地，不要說此刻在中國，找不到慈禧太后以外可以獨當一面的單身女性，縱使有，大概也沒有多少出人頭地的機會。「萬國賽珍會」檯面上從未見到任何中國未婚女性，中國男性推出作爲其代表的女性配偶，作

爲對租界官商夫人的對口，也可從這個角度理解。檢視歷史，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只辦得到歷史條件許可的事。1907 年的中國，只能倉促拿出手上握有的資本：開辦兩年的農工商部繡工科和該科繡工科的學生們，以及 1906 年沈敦和從洋人手中接過的上海天足會，也包含前一年成立與天足會連結的女學堂。若獲邀參展時間提早一點，中國都未必有實質回應的能力。七年之病，僅得兩年之艾，看似勉強，然則「苟爲不畜，終身不得」。

不論繡工科的刺繡或新式學堂的女紅，就工藝產業而言，需要的不是培養個別藝術家，而是訓練大量的生產人力。20 世紀初，中國新式教育沒有以藝術爲目標的官方藝術學院，官方之外的專業藝術教育商業化，原因都在於此刻在國家層次的藝術定義，偏向產業而不是個人修養。[101] 如同前文所述，即使刺繡與女紅被認爲是符合傳統居家女性角色分派的藝術實踐，當刺繡成爲行業，其專業仍然操持在男性手中。因此，1907 年中國之所以能藉著女性工藝回應兩個國際展覽，値得注意的並非女性投入這些藝術實踐，而是在新政的教育與產業政策鼓勵國民投入實業生產的背景下，女性被鼓勵在原本的家居脈絡之外，從事這些藝術實踐，進入過去由男性操持的產業中。農工商部繡工科如此，女學堂中的新式女紅如此，放入一個更大的脈絡，新式教育納入女生的邏輯亦同。當女性被號召加入生產大軍，便等於必須給予女性和生產大軍中其他成員相同的裝備、類似的權利。也就是說，單單要求女性加入生產陣容，卻又同時要求她們維持固有的性別角色分派，留在家庭中，是互相矛盾的。這個對於

101 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頁 29-38。

經濟利益的追求，比起「女權」之類的倫理訴求更爲有力，因爲單純讓渡性別權利，只需要許多人都辦得到的道德努力，能抵抗利益誘惑者則庶乎聖賢。

繡工科的設立，來自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動員女性生產力的企圖。設立繡工科的農工商部，同時也是專責回應國際博覽會的部會，而刺繡品又長期是在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的重要展品，值得思考的是，此刻刺繡被認定爲屬於女性的藝術實踐。另一方面，如果天足會具有解放女性的作用，天足會女學堂則是基於令放足女性取得自立能力的目的，而天足會女學生送交「萬國賽珍會」的工藝品，則是小學堂藝術科目中與男性手工相對的女紅。和刺繡一樣，這是一個被賦予性別意義的學科，差別在於這個專屬女性的學科，與學堂中其他無性別區分的學科建立了連結。事實上，如果本文之前將繡工科的刺繡與女學生的人造花當作傳統，與新式女子工藝的對照，在此仍可以做更進一步的區分：相對於傳統繡廠或家庭刺繡，繡工科的刺繡在藝術形式上是相對新式的。這不僅可以由繡工科教學內容中納入新式教育的圖畫得見，到了 1910 年南洋勸業博覽會，北京繡工科與其他湘繡、粵繡等的傳統刺繡的差距，更爲明顯。如果說，刺繡過於仰賴了（男性）畫稿而更爲牢固地將女性誘陷在「擅長」的複製中，新式學堂女紅則因爲融入在普通教育中，而少了些性別指派，歷史證明無性別區分的教育才是眞正翻轉女性社會角色的主要力量。

1897 年，梁啓超在〈論女學〉中說：「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102] 言下之意，似乎中國只有男

[102]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氏著，《飲冰室合集》（北京：中

性工作，女性全都閒在家中，不事生產，而在生利的標準下，工作的位階明顯高於休閒。但這很明顯的是男性對工作與閒暇的定義，如果只有在家庭框架之外的工作才叫作工作，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償家務，自然也不屬工作的範圍。諷刺的是，換到女性的角度，許多男性的休閒其實倚賴的是女性的工作——不論是茶飯伸手的悠閒，或花間月下的娛樂。另一方面，按照這種男性的定義，男性工作才會有工作與不工作（閒暇）的區別，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內外對照。相對地，如果女性的所有活動皆被視爲不工作，缺乏不工作的對立項，潛在地等於認定女性有內無外，因此也沒有工作與閒暇的區別。如果動員女性投入生產，將她們（男性定義）的閒暇換成（男性定義）的工作，那麼在女性身上，便同樣會出現和男性一樣的工作與閒暇的對照，從而使得原本的性別角色定義開始動搖。

回到本文之首的引言。胡適友人考察文明的並非同質的三件事，「女人」與「小孩」指涉的是基本人類關係，而且是以舉隅方式列舉，但「閒暇」之中隱含的卻是看待文明（或文化）中所有事物的思考方式。這種方式從整體角度在考量一件事物時，同時考量其對立項，且這些二元對立項之間，並非此消彼長的爭奪關係，而是合而爲一個整體。因此，如果單一項獲利的結果是造成整體受損，這種利益就不是在整體層次上的利益。個人生命與社會文化中的所有事物，幾乎都可以放在這種模式下看待：晝／夜、戰爭／和平、身體／靈魂、理性／慾望、個人／群體等，當然也包括社會中性別

華書局，1989），冊 1，頁 37-44；原載於《時務報》，冊 23、25，1897。

角色的問題。[103] 但是這種二元整合只是一個抽象框架，在不同的歷史文化中有不同的組態，既沒有普遍形式，更沒有終極答案。20 世紀初的中國新政，將女性帶出舊時家庭框架，外交、經濟與慈善的理由，因緣際會地促成了中國女性在 1907 年踏上這兩場展覽前臺。就女性社會角色改變而言，這兩個 1907 年的事件或許只是歷史偶然，事件的出發點在中國並非基於性別權力的考量，但使得事件發生的條件卻不是偶然，因爲這些條件在之後繼續產生類似的例外。當例外越來越多，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規則，或許文明的意義就在於從整體角度，對這些相對價值的持續評估。

103 本文懸置 Judith Butler 所謂體制化異性戀(institutionalized heterosexuality)衍生的問題；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0), chapter 1, Subject of Sex/Gender/Desire, pp. 1-34.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 02-20-001-02-001～0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英屬澳大利亞梅勒本地方女工賽會案」，檔號 02-20-001-02-009-049～05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比使照請派員赴安法爾斯萬國衒奇會及附設化學會議案」，檔號 01-27-012-01-000-0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舊署清檔），〈各國賽會公會〉，「日本公使照請中國赴大阪關第五次勸業博覽會案」，檔號 02-20-001-01。

（二）文獻史料

沈壽述，張謇錄，《雪宧繡譜》。江蘇武進涉園重印版，1927。

張春帆，《九尾龜》，中國近代小說全集，第 1 集。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

（三）期刊

〈內務・農工商部奏釐定本部職掌員缺摺〉，《東方雜誌》，卷 4 期 2，1907 年 3 月，頁 61-66。

〈農工商部部具奏繡工科擴充辦理情形摺〉，《農工雜誌》，期 3，1909 年 3 月，頁 13-15。
〈實業・各省工藝彙誌〉，《東方雜誌》，卷 3 期 10，1906 年 11 月，頁 194。
〈閣部院官制草案・農工商部官制草案〉，《東方雜誌》，卷 3 期 13，臨時增刊，1907 年 1 月（光緒 32 年 12 月），頁 36-37。
〈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東方雜誌》，卷 4 期 4，1907 年 5 月，頁 9278。

（四）報紙

《申報》（上海），1886、1905-1907。
The Argus (Melbourne), 1906-1907.
The Australasian (Melbourne), 1906.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06-1907.
The Border Watch (Mount Gambier), 1907.
The Queenslander (Brisbane), 1907.
Western Mail (Perth), 1907.
The Register (Adelaide), 1907.
The Maitland Daily Mercury (New South Wales), 1907.
The West Australian (Perth), 1907.
The Advertiser (Adelaide), 1907.

（五）專書

張玉法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1904 年－2003 年》。臺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2004。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冊 1。北京：中華書局，1989。

楊永安，《長夜星稀——澳大利亞華人史 1860-1940》。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

楊堅平編，《潮繡抽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楊興梅，《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André, Jean-Marie. *L'otium dans la vie morale et intellectuelle romaine des origines à l'époque augusté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0.

Fiske, Alan P.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Horkheimer, Max &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ited by G.S. Noerr,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Sear, Martha. "'Common Neutral Ground': Feminising the Public Sphere at Two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n Exhibitions of Woman's Work." In Kate Darian-Smith, Richard Gillsepie, Caroline Jordan and Elisabeth Willis, eds., *Seize the Day: Exhibitions,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2008. e-revison,without page numer.

Shen, Lindsay. *Knowledge is Pleasure: Florence Ayscough in Shanghai*. RAS Shanghai Se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Toner, J.P. *Leisure and Ancient Ro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六）專文與論文

王文軒，〈慈禧繡莊今何在〉，《科學之友》，2008 年 10 期，頁 91。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421-475。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卷 24 期 3，1986 年 9 月，頁 249-266。

朱柔若，〈職場中的性別主流化：從性別統計看就業平等政策之成效〉，《城市發展》專刊，2010 年 10 月，頁 8-25。

池子華、馮欣，〈近代中國災荒及其救濟〉，《文化學刊》，2009 年第 2 期，頁 67-73。

余覺，《余覺沈壽夫婦之南通痛史》。上海：出版社不詳，1926 初版。

吳方正，〈中國近代初期的展覽會——從成績展到美術展覽會〉，收入顏娟英主編，《中國史新論．美術考古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

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收入顏

娟英主編，《上海美術風雲——1872-1949 申報藝術資料條目索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年 6 月，頁 1-45。
呂紹理，〈展示臺灣：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臺灣史研究》，卷 9 期 2，2002 年 12 月，頁 103-144。
李長莉，〈臺基、姘居之風與自主擇偶觀念〉，《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李斌，〈社會性別與報刊中建構的刺繡印象——以 1920-1925 年《申報》爲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7 期 4，2010 年 7 月，頁 126-129。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頁 6-13。
周秋光、楊智芳，〈論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卷 35 期 4，2006 年 7 月，頁 115-121。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期 16，1991 年 8 月，頁 139-180。
邱敏芳，〈金城繪畫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3。
金家虹，〈曾經的輝煌——宮廷繡〉，《浙江工藝美術》，2008 年第 3 期，頁 17-18。
胡適，〈游萬國賽珍會感賦〉，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冊 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胡適，〈慈幼的問題〉，收入氏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苗延威，〈晚清寓華「洋貴婦」的社會參與——以上海天足會(1895-1906)爲中心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 82 第 1 分，2011 年 3 月，頁 129-167。
張鳴，〈男人的不纏足運動〉，《二十一世紀》，期 46，1998 年 4 月，頁 60-69。
許峰源，〈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清末中國博覽會的興起〉，收入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郭常英、岳鵬星，〈近六年來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評〉，《中州學刊》，2014 年第 10 期，頁 136-141。
曾桂林，〈近 20 年來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147-160。
楊茜，〈粵繡——男繡娘和鬥牛士的披風〉，《環球人文地理》，2012 年第 9 期，頁 25-31。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卷 21 期 2，2010 年 6 月，頁 107-164。
劉凡，〈論沈壽對中國刺繡藝術的貢獻〉。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樊超杰，〈光緒三十二年蘇北水災賑濟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樂童、孝娥，〈追述沈仲禮君之家庭〉，收入孫善根編著，《中國紅十字運動奠基人沈敦和年譜長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頁 77-82。
Bondanella, Julia Conaway. “Petrarch’s Rereading of ‘otium’ in De ‘vita

solitar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60:1, Winter 2008, pp. 14-28.

Burke, Peter. "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 146, February 1995, pp. 136-150.

Davies, Celia.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d the Profession of Gender." *Sociology* 30:4, November 1996, pp. 661-678.

Fong, Grace S.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pp. 1-58.

George, Sam. "Linnaeus in Lette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emale Mind: 'Botany in an English Dress'."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8:1, Spring 2005, pp. 1-18.

Glick, Peter., Susan T. Fisk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March 1997, pp. 119-135.

McNair, Bruce G. "Cristoforo Landino and Coluccio Salutation the Best Life." *Renaissance Quarterly* 47:4, Winter 1994, pp. 747-769.

Shiff, Richard. "Originality." In Robert S. Nelson & Richard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03-115.

Taylor, Elizabeth. "Lady Northcote: Leading Light and Sponsor of the 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en's Work." In Rosemary Francis, Patricia Grimshaw, and Ann Standish, eds., *Seizing the Initiative: Australian Women Leaders in Politics, Workplaces and Communities*. The 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2, pp. 37-49.

Willoughby, Emma. "Woman Making an Exhibition of Herself: The Women's Work Exhibition, 1907." *Melbourne Historical Journal*

29, June 2001, pp. 158-169.

Wood, Paul. “Commodity.” In Robert S. Nelson & Richard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57-280.

（七）網路資料

Attard, Bernard. “Australia as a Dependent Dominion, 1901-1939.” Working Papers in Australian Studies No. 115, Sir Robert Menzies Centre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 http://www.kcl.ac.uk/artshums/ahri/centres/menzies/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115Attard.pdf（2014 年 10 月 11 日檢索）

Mikkola, Mari.“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Gender.”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2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2/entries/feminism-gender/（2015 年 10 月 20 日檢索）

Wood, Paul. “Gertrude Bass Warner”: http://library.uoregon.edu/speccoll/photo/warner/index.html（University of Oregon, Libraries, Gertrude Bass Warner 簡介）（2014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Women and Exhibitions: A Case Study of Two Exhibitions in 1907

Fang-cheng Wu*

Abstract

Systems of gender roles have long constituted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derwent a major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This article aims neither to investigate a more or less vagu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nor to list the political claims made for gender equality, but rather highlights those institutions that incited Chinese wome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society, even unconscious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new type of public activity in which visibility was sine qua non: exhibitions.

Two exhibitions held in 1907 are examined here. The first is the First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an's Work at Melbourne, in which China participated. The second is the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ête at Shanghai, which mobil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omen in the Settlement. Both exhibitions shared the particularity of having been exclusively of and by women, at least in

* Wu Fang-Che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CU

principle. China's response revealed the intention of incorporating women into a national productive force, without being fully aware of the repercussions on women's social status. China's participation offered an opportunity for women to gain a larger social space, and consequently to question the older system of gender roles.

Keywords: gender roles, institutions, exhibitions, Australian Exhibition of Woman's Work, International Fancy Fair and Fête